



柳州文史资料

【第八辑】



《柳州文史资料》第八辑

封面题字：钟家佐

主 编：覃克光

编 辑：韦桂芳 陈佚生 于辉云 谢朴生 蔡增强

柳州市科技印刷厂印刷

字数：100千字

1991年6月

区准印证 NO1093

不可忘却的记忆

——怀念陈枫同志

胡习恒

1986年9月初的一天，我从北戴河返回柳州路过北京时，惊悉陈枫同志于8月26日在北京因病不幸逝世，噩耗传来，我感到十分悲痛。他的去世，使我失去一位敬爱的老领导、老战友。他离开我们五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常常在我的脑际中浮现。他那广阔的胸怀，高尚的品德，严谨的作风，诚挚的情谊使我难以忘怀。

陈枫同志系广东省阳山县人。1935年他在广雅中学读书时就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教育，并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和抗日民主运动。1936年5月，他加入了中国青年抗日同盟，领导广州市学生声援北平“一二·九”运动。1937年11月，被学校当局勒令退学。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他与几位进步同学一道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军事知识。不久，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1938年2月，他在延安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同年5月，党组织派他回广东参加地下工作和敌后游击战争。他工作深入，联系群众，实事求是，工作取得较好成绩，很快就被选拔为党的领导干部，曾任中共广东省从化琶江工委书记、中共广东江北路东地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中共广东江北地委委员。

1946年8月，陈枫同志受党的委派，来到广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9年10月，他去香港开会，后经广东随军回广西，先后在中共梧州、柳州、南宁市委和市人民政府任领导职务。

1950年任柳州市委书记，后调任广西人民政府民政厅副厅长、中共南宁市委书记、市长。1965年1月，调国家外交部任亚洲司副司长，在阿富汗、布隆

迪、冰岛和毛里求斯等国任大使职。他离休后，应邀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别咨询员、南宁市委和市人民政府高级顾问。他不辞辛苦，不计较报酬，努力为广西的“四化”建设贡献力量。

二

1942年7月9日和1943年1月15日，广西先后发生骇人听闻的“七·九”事件和“一·一五”事件。广西反动当局顽固坚持反共立场，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中共广西省工委的一些领导被捕牺牲，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共广西省工委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省工委书记钱兴同志，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带领广西地下党人坚持斗争。

当时，党中央考虑到广西是边境，地理位置重要，应该加强这个地区党的领导工作。特别是“七·九”事件后，广西城市中党的领导干部缺乏，一部分干部又转入农村，组织力量受到削弱，而广西反动当局统治残酷，控制严密。为此，中共香港分局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派出力量，分三条线进入广西加强工作，把被破坏的党组织重新恢复起来，为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做好准备。陈枫同志受派担任其中一条线的领导职务，进入广西。

陈枫同志于1946年8月到达桂林，先后担任桂柳区特派员、书记、中共广西省城工委书记，直接领导桂、柳、邕、梧四个城市党的工作。他到广西不久，就打开了工作局面，党的活动很快活跃起来，特别是在柳州，几个重要据点如龙城中学、柳州高中、柳庆师范、柳州高工、柳铁、水厂、电厂和郊区等党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党领导的中国爱国民主青年解放联合会等10个外围组织，也在柳州建立和发展，使之成为党的有力助手。党员的积极性也随着高涨起来，各项工作都有很大起色。

陈枫同志一进入广西就着手于调查研究，了解广西政治、军事、经济的情况。接着便与广东因“南委事件”转移到广西来的党组织接上关系，统一组织活动，共同开展工作。1947年8月初，陈枫来到柳州，与柳州党组织接上关系。当时熊元清和我是柳州党组织的负责人。陈枫到我们的机关驻地古香东路18号楼

上与我们开了三天会，他首先向我们详细了解柳州党组织和党员的情况，特别是了解我们对当前形势的看法。还问我们工作有什么经验教训，有什么困难，今后有何打算等等。接着传达桂柳区工委召开的“七月会议”精神，说明他到广西来的任务。他分析形势，要我们充分认识反动阶级的本质及反动派两面派手法，不能对他们抱有任何幻想。他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柳州党组织的成绩，鼓励我们树立信心，克服当前遇到的困难，努力把党的工作做好。最后，他布置工作，着重提醒我们，要抓住工作重点，要大胆放手在柳铁、工厂、学校和其他重要的机关中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特别是要有计划地培养、发展工人和积极分子入党。要注意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他强调，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工作，一定要重视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严格执行“秘工条例”。从这次会议开始，陈枫同志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位具有丰富的地下革命斗争经验的领导者，对形势的分析是那样的透彻，对工作的布置又如此精心。从此，我向他学习，提高了领导思想和艺术水平，把工作搞得更好。

三

由于陈枫同志在白区工作具有丰富的经验，他调来广西领导桂柳区和后来的桂、柳、邕、梧四个城市的地下工作，自始至终都处在主动地位，直到广西解放，不但柳州党组织和近 200 名党员未受到损害，就是党的外围秘密组织 300 多名成员，也未发生过意外事故。

陈枫同志领导的党组织之所以能够顺利开展工作，是和他工作严谨，有胆有识，善于掌握斗争的规律，善于分析判断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桂柳区工委机关的转移一事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开始桂柳区工委设在桂林，他经过短短时间的工作实践就敏锐地察觉到工委机关设在此地不适宜。他认为桂林是广西省府的所在地，是广西反动统治的中心，军警特务机关林立，反动当局控制严密，过去省工委设在这里曾遭到严重的破坏。相比之下，柳州是桂中腹地，交通四通八达，地下工作基础较好，党组织从未遭到破坏，在柳州开展党的活动比在桂林有利。桂柳区工委根据陈枫同志的意见作出决定，将机关搬到柳州。

后直到解放，党组织未遭到任何破坏。

陈枫同志处理事情，胆大心细，非常谨慎，又善于征求和倾听同志们的意见。根据党组织规定，他的住地，不能收藏党的文件。于是他问我，什么地方可以收藏？我说，柳州省立医院的手术室是收藏文件较安全的地方。因为医院不带政治色彩，不为敌人所注意，手术室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去的，环境不复杂；而且医院里有党员和“爱青会”会员在活动。工农解放联合会成员黄瑞琪就在手术室里工作，他办事稳妥，钥匙由他掌握，可将文件锁在不用的医疗设备的木箱里，由黄亲自保管，我送取文件找黄也很方便。陈枫听后思考一下，当即表示同意。此后，陈枫送取收藏的文件，都由我经手，一直没有发生过意外。

四

陈枫同志十分重视对党员的教育，使党员在政治上紧跟中央的步调。他要求我们认真学习中央文件，领会精神实质，结合实际，贯彻执行，做好工作。他特别强调，我们地下党员，没有受过革命斗争严格的考验，需要经常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严格执行“秘工条例”。他提醒我们，搞地下工作，随时有被捕的可能，要随时准备好应付敌人审问的口供。一旦被捕，自己的政治面目为敌人掌握，要勇于斗争，宁死不屈。经得起革命的考验，才是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真正的共产党人。他还说，只要我们认真执行“秘工条例”，是不容易遭到敌人破坏的。

当时，陈枫同志每隔三四个月就要乘飞机去香港分局开会或汇报工作。买飞机票要证明，过海关也要检查证明。陈枫同志和我们共同想个办法，通过在柳州省立医院掌握公章的爱青会员唐志光的关系，取得该院的信封和盖上公章的空白信笺，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但后来又遇到另一个难题，按组织规定，领导干部是不准随身携带文件和资料的，而有时又需要带出差。有一次，陈枫去香港开会，只好带上党员熊柳生一同去。他又想出了个办法，买了10盒柳州特产云片糕和一些物品，将带去的材料藏到云片糕最底层的盒子里，由熊柳生自带。他们先商量好，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沉着应付，大大方方，随机应变。

不出所料，在出境时，海关人员果然检查，把云片糕一盒盒打开，当开到第五盒时，看到熊柳生同志沉着镇定如常，就不继续检查了，他们就这样安全的出境。

陈枫同志在解放后 1950 年担任中共柳州市委书记，他继续保持和发扬过去的优良工作作风。在工作中从不满足于一般号召和光靠开会解决问题的做法，而是扎扎实实地深入到重点单位去检查工作，认真调查研究，以点带面，帮助基层。当时，新的人民政府刚刚建立，情况复杂，问题很多，即使工作再忙，也抽时间到基层去。陈枫同志对重要的工作问题，从不轻易表态，先听取大家的意见，后经研究才作出决定。他还经常亲自手写工作报告和总结，修改文件。有时工作太忙，就给秘书提出要点，写出初稿，然后反复修改。他的优良作风，给各级领导干部作出了榜样。

陈枫同志对待干部既从严要求又宽厚以待，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从不以领导者自居，而是以革命同志平等相处，就是对有缺点的同志，也不是横加指责，而是耐心做思想工作。1948 年秋的一天，陈枫同志带了两份重要文件给我和熊元清同志，要我们认真阅读。两天后，陈枫同志便按时来取回。由于文件收藏在房内要经常更换地方，我一时想不起来，找了又找，还是找不见。这不是一件小事，我想这下一定被陈枫同志狠狠批评了，因此心里很紧张，急得满头大汗。但出乎我预料之外，见面时他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再三安慰我，要我好好想一想，还说细心找找，总会找到的。接着他提示，要我回忆，如带过文件外出没有？是否给元清同志带回去看？有什么人来过家里？对这些询问我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他听了反复思考后严肃地说，如果真的找不着，为了党组织和你个人的安全，必须严格执行“秘工条例”的规定，你应该尽早地撤离柳州，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并做好梁次芳（我爱人）同志的思想工作，家里有什么困难，组织会照顾的。我当即表示，接受党组织的决定。他接着说，明天再来作具体安排。我把这件事如实地告诉梁次芳，她也很焦急，我们俩立即翻箱倒柜地再找了一遍，终于在架床板的长凳子上找到了。第二天陈枫到来时，我就向他报告情况，把文件交给他，并向他作了检讨。他看了文件，露出了微笑，没有责怪我，和蔼地说，文件找到就好了，没有暴露，你就不必转移了，以后要吸取教训。他的言行使我深受教育。是的，一个同志有了缺点和错误，当他

懂得错在哪里了，这时关心帮助他，和他一起总结教训，总比再加指责的效果要好得多。

五

1949年上半年，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形势，对我们开展地下斗争越来越有利。越是在这种形势下，斗争也就越激烈，越残酷。5月14日，我党在柳州散发了《警告特务书》的传单后，敌人惊恐万分，进行疯狂反扑，于是准备对龙城中学的方宏誉、罗杰林、毛恣观、唐美贞四名党员教师下毒手。眼见特务出入龙中频繁，敌人很快就要行动了。5月19日上午，陈枫、梁山、熊元清和我开个紧急会议，研究对策。陈枫明确指出，这是特务机关对我们散发传单的报复，一定要千方百计保护好我们同志的安全，这情报是从党员丘行那里得来的，为了丘行的安全，也要同时设法尽快转移。根据陈枫同志的意见，我们将计就计，在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当晚八时前，将这五名党员安全转移了。接着在社会上放出消息，说五位老师已“失踪”。由龙中党员和进步学生组成“寻师委员会”。还在《广西日报》（柳州版）上刊登“寻师广告”大造舆论，给敌人施加压力。特务机关被搞得昏头转向，互相猜疑埋怨。这一事件引起广大群众对柳州反动当局的愤恨。这就是当时震动柳州的龙城中学“寻师运动”。经过10天的斗争，陈枫同志对我们分析了当前局势，他明确指示，运动已达到我们预计的目的，通知龙中党组织和有关党员，不必继续与敌人纠缠。

由于龙中党组织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仇视，1949年9月中旬，国民党当局以历年底纵“匪党”为由，下令强行解散了龙中，并企图逮捕龙中校长高天骥。高校长是与我党合作多年的老朋友，向我们多次提供敌人的情报。我们介绍到龙中工作的老师，多数是党员和进步分子，政治面貌虽然没有告诉他，但他心照不宣，也从不拒绝。后来，根据他的表现和要求，党组织批准他参加党领导的爱国民主人士解放联合会为会员。他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当陈枫同志得知高天骥的处境时，即指示我们，千方百计把他救出虎口。经过我们精心安排，终于及时把高天骥转移出来，暂时安排在厚生农场森林中的龙壁山沟里

居住。陈枫很关心高天骥同志，当时他到这里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亲自去草棚看他，亲切地安慰他，肯定他对革命事业作出的贡献，并问他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当高天骥得知来看望他的就是省城工委书记陈枫时，便紧紧握住陈枫的手，激动地说：“我没有什么困难，同志们对我的生活和安全都很关心，我只有一个要求，要做个和你们同生共死的革命同志，不要把我留在党外当朋友，请审查批准我加入党组织，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陈枫同志说：“我们不会忘记你对党所作的贡献，你的要求很好，党组织会尽快研究，你要多多保重身体，我们将转移你到农村比较安全的地方去，安排好你的生活，请你放心。”陈枫同志离开草棚后，一再嘱咐我们，一定要采取有力的措施，保证高天骥同志的安全，还要求我们常和他谈心，在政治上多关心帮助，在生活上要特别照顾好，要抓紧时间研究他人党的要求等等。不久，高天骥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高天骥对陈枫的诚挚信任，十分感激和钦佩。

解放后，陈枫同志因工作需要调离柳州。多年来，他对柳州的建设、改革开放十分关心，对曾在柳州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也很关怀。他路过柳州多次，看到柳州现状时，激动地说：“柳州建设和改革工作，取得较好的成绩，我感到十分高兴。”他每次回到柳州，都有不少同志来看望，他都热情接待和亲切地交谈，关心地问大家的身体健康和工作生活情况，特别是问到还有哪些同志因“文化大革命”受冤屈应落实政策现在还未落实。他还亲自到身体状况不太好的黎达愚、徐锡文等老同志家里探望。老领导的到来，大家非常感动。有一次他到南宁参加区党史办召开的党史座谈会时，得知高天骥同志病重住院，就约我陪他去看望。高天骥见到陈枫同志时非常感动，阶级的友爱，同志的情谊，领导的关怀，使他激动得老泪纵横，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紧紧地握着陈枫同志的手。陈枫同志离开时，高天骥再三感谢老领导的关心。1986年1月，陈枫和爱人吴素梅同志路过柳州时，得知我住院治疗，他俩特意到医院看望我，问我的病情，生活有什么困难等等，离开时安慰我安心治病，还送了一瓶他自己随身备用防治心脏病的心宝药品给我。他们回北京不久，又给我来信，问我的病情和身体康复情况，并鼓励我把病治好。使我无比的感动，这不是一瓶普通的药和简单的信，这是一颗凝聚同志情谊的心啊！

陈枫同志为党工作50个春秋，终年70岁。他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光辉的形象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我和陈枫同志一次难忘的会见

叶生发

在抗日战争时期，民盟主张坚持抗日，争取民主，加强团结；抗战胜利后，民盟拥护中共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由于政治主张与中共有不少相同之处，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各地民盟得到中共的支持和指导，与共产党亲切合作。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撕毁旧政协协议，单独召开“国大”，镇压民主运动，遭到中共和民盟的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穷凶极恶，暗杀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1949年7月桂系当局也在同一天，在南宁逮捕了民盟省支部领导人杨荣国、张毕来，在桂林逮捕了丘林、方亢等九名盟员，在八步逮捕了刘彦忠。民盟省支部的其他领导人徐寅初、欧阳予倩、林砺儒、张锡昌、石兆棠、周匡人、宋云彬等也在此之前先后离桂到上海和香港等地，广西民盟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

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迫解散民盟中央总部，民盟部分领导人沈钧儒等，由上海、南京赴香港，于1948年1月在香港召开民盟三中全会，重建民盟中央，公开宣布与中共密切合作，发出了“为彻底推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的号召。民盟与中共的斗争目的更为一致。广西民盟在桂林的谢之雄、王兆南，在南宁的梁成业、叶生发先后到香港向民盟中央汇报工作，听取民盟中央的指示，并重新组成了民盟广西支部领导小组，由在广西内地的杨荣国、叶生发、梁成业、驻香港的周匡人、宋云彬等五人负责。

1949年上半年，在南宁师院的民盟组织与中共地下党合作，积极投入全院师生的反对学校反动当局运动。同年4月，桂林省府主席黄旭初借视察名义，到南宁攻击师院盟员教授和进步教授，煽动学生闹学潮，逼迫他们离开广西。为了防止意外，民盟省支部决定，领导人先后撤离南宁。4月杨荣国、张毕来随同一些进步教授去湖南，梁成业于6月底毕业，暂到柳州，我也于7月离开

南宁准备去桂林找工作，在南宁的民盟组织由刘润贤负责。7月初，我与梁成业在柳州相会。当时广西已是解放前夕，对今后如何工作，是民盟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梁成业的工作当时也没有着落。过去民盟组织是由他负责与地下党联系，我和地下党没有直接的联系。以后，我和他不在一个城市工作，我与地下党如何联系也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所以我提出想直接与地下党的负责同志谈谈，梁成业也同意。但是，我又感到是否要求过高，因为在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一律逮捕，格杀勿论”的白色恐怖中，一个地下党的负责人很难与党外人士约会，而且地下党负责同志在什么地方，更是秘密的事。

过了两天，梁成业通知我：明天上午10时，在柳侯公园的柳宗元墓碑前有一个人与你相见，称号是“大张”。我很高兴，按时到指定的地点。当时旁无他人，我与已在那里等候的“大张”对上符号，互相招呼之后，便一同从公园的后门朝弯塘路走去，到路旁的草地坐谈（地点即现在的弯塘小学，当时是旁无住房的荒地）。“大张”同志首先给我的印象是和蔼可亲，待人诚恳，平易近人，一见面便感觉他是一个亲密的战友，彼此之间可以无拘束的交换意见。我先扼要地介绍南宁的政治形势，南宁师院的“赶黄”斗争情况，接着介绍了民盟的工作和我离开南宁后准备到桂林工作的想法，并征求他对广西民盟今后工作的意见。大张的谈话很诚恳，他认为广西当时和以后的形势，主要是受掌握军权的白崇禧控制，白崇禧准备顽抗到底，正在湖南的衡阳、宝庆一带布防与我军决战，广西的和平解放希望不大。他说，柳州最近一个时期，没有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桂林的情况，过几天我们有人来才清楚。他赞成我去桂林找工作，如可能最好到国民党省府去，那里我们还缺乏联系的人。他请我留下我在桂林的通讯地址。等我在桂林找到工作，有个落脚的地方，他再派人去与我联系。谈到民盟今后的工作，他说，根据民盟组织和成员的情况，可进行搜集情报、统战策反，做好迎接解放军的准备工作。最后，他告诉我，他准备过几天扮作商人，乘飞机去香港，如果有需要转告民盟中央的事，他可以代为转达。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便分手离别。

我离开柳州，先回到荔浦老家，后曾数次到桂林与民盟组织联系。当时桂林的形势已相当紧张，我在桂林找不到工作，也没有直接与地下党联系，但已

知桂林的民盟小组已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在地下组织的指导下做迎接解放军进城的工作。桂林市解放的前一天，我从荔浦到了桂林。桂林解放不久便到桂林军管会文教接管部工作。1950年1月又转到南宁。以后在省文教厅和南宁师范学校工作。1951年寒假，由南宁去桂林，受民盟广西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委托，路过柳州，与中共柳州市委负责统战工作的同志接洽，研究筹备成立民盟柳州小组的事。一天下午，我得到通知：中共柳州市委书记约我晚上相见。见面时，我大为惊讶，原来市委书记陈枫同志就是1949年7月与我会见的地下党负责人“大张”同志。这时我才意识到当时他那热诚、亲切的谈话，已把我当作与地下党合作的民盟负责人和亲密战友。他对我的政治信任和诚恳热情，使我终生难忘。

鹅山柳水仰高风 ——回忆柳州市第一任市长魏伯同志

严祖锐

魏伯同志是河南省蒙阳县人，他在 30 年代就参加了革命工作。1949 年随军南下。柳州解放后为柳州市人民政府第一任市长，后任中共柳州市委书记。1951 年调离柳州，1984 年 8 月于北京逝世，终年 70 岁。魏伯同志调离柳州已有 37 个年头，离开人世也有 7 年了，然而时至今日，凡是与他熟悉的干部和群众，谈起当年的魏市长，对他高尚的思想情操和优良的领导作风，普遍称赞和敬仰。这里我回忆二三事。

—

1950 年 9 月，我在武汉大学财经学院（即现在的中南财经大学）毕业后分配来柳州，安排在市政府政策研究室工作。当时政研室是由魏伯同志直接抓的。他住在哪里，政研室就设在哪里；他搬到哪里，政研室也就搬到哪里。我一直在他身边工作。魏伯同志留给我第一个深刻的印象是他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魏伯同志是抗日战争前的大学生，抗战爆发后到延安，在延安时期是知名的党员作家，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政策水平和工作水平，又有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孜孜不倦地加强自身的学习，不断深入调查研究，深入实际，联系群众，求得真知灼见，掌握科学决策和领导工作的主动权。他下厂检查工作常带我们下去。在工作方法上，一般不是先听厂领导干部的泛泛汇报，而是同我们一起先分头深入到职工群众中去，掌握第一手材料，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在这基础上才找领导班子来汇报。他边听汇报边提出问题。从所回答问题中看出厂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和政策水平以及工作作风和方法，边谈边商量。这样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工作意见，有效地帮助基层领导提高水平。魏伯同志在柳州的干部和群众中有较

高的威望，我想这是同他坚持认真深入基层，联系群众，认真作调查研究工作分不开的。这里我想起了一件小事。

1951年柳州解放不久，国民党溃逃留下一些残兵败将，他们勾结地方反动势力，不断进行破坏和捣乱，敌我斗争尖锐复杂。柳州市驻街道工作队为了掌握敌情，先在弯塘路搞试点，开展了一场坦白登记运动，要求有问题的人都要到街委会和工作队那里去坦白登记。在试点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工作队给魏市长写了报告，要求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弯塘路的作法和经验。弯塘路的作法是否妥当，能否在全市推广，魏市长感到还没有把握，要我再去作个调查。接受任务后，我去找工作队的领导、街道干部、积极分子了解情况。他们一致认为试点作法很好。于是我写了一篇调查报告，肯定了弯塘路的作法。

魏伯同志看了报告后，把我找去，提了几个问题：你这次调查找了哪些人了解情况？坦白登记的人交待了哪些问题？坦白登记后的思想情绪怎样？当魏市长得知我只是找了工作队领导、街道干部、积极分子了解情况时，当即指出，“仅仅找这些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直接找那些坦白交待问题的人作调查，才能了解这些人在坦白登记后的真实思想和工作的实际效果。”

我按照魏市长的指示，再次去弯塘路作调查，果然就发现了问题。弯塘路的作法由于政策界限不清，扩大了坦白登记的范围（中央规定，敌特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才必须向人民政府坦白登记）。当时连一些菜农捡到国民党军队丢弃的手榴弹用去河里炸鱼的事也坦白登记了。坦白登记以后不是放下了包袱，而是增加了顾虑和恐惧心理，有的夜晚听到狗叫，就以为人民政府派人来捉自己，急忙起身穿衣，准备去坐牢。这种作法实际上混淆了敌我界限，使一些不属于敌我矛盾的基本群众，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而增加了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疑虑。实践证明这种作法的效果是不好的。我第二次写的调查报告便对这种作法作了否定的结论。魏市长看了这个调查报告后作出决定，不在全市推广弯塘路的作法，也不再在弯塘路继续搞群众性的坦白登记运动，而是要认真做好干部、积极分子和群众的思想工作。后来这样做，更好地推动了工作的开展。

二

魏伯同志留给我的另一深刻印象是他以身作则，对工作极端负责，在干部中起了很好的榜样作用。

解放初期，城市工作千头万绪，工作繁忙，魏伯同志很关心大家劳逸结合。可是他却废寝忘食地学习和工作。每天中午一般只休息一二十分钟就起床看文件和处理工作了。为了带动大家做好对群众的宣传发动工作，他常利用晚上休息时间，亲自动手为《柳州日报》撰写不少高质量的社论和文章。他曾以“金川”笔名撰写系列文章。这些社论、文章紧密结合实际、中心突出、短小精干、深入浅出、说服力强，对解决群众的重大认识问题和推动党的中心工作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

魏伯同志作的重要报告，经常是自己亲自动手写，而不要秘书代劳。有时他采取口授的方式，由政研室派一位同志作记录。他在办公室内来回踱步、全神贯注、思路敏捷、语言流畅地把准备作报告的内容口述，然后把记录稿加以修饰加工，就成了一篇好讲稿、好文章。魏伯同志能够这样做，不仅是因为他有较深厚的理论、政策、文字功底，有较强的分析概括能力，而且也由于他经常深入群众，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该批评什么，倡导什么，心中都有数，因而他的报告讲得生动深刻，听者很有启发。有的干部反映，少听魏伯同志的一次报告是一种损失。

魏伯同志从培养、提高干部的需要出发，从50年代初即着手抓干部的理论教育，在全市建立起比较正规的学习制度、组织和考核办法，并亲自抓由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组成的高级组的学习。在广西，他率先设置了专职理论教员。我和扬相时同志就是由魏伯同志提名调去市委宣传部担任专职理论教员的。为了培养提高我们这些年轻的理论教员，魏伯同志叫我们旁听高级组的学习讨论，从中受到启发和教育。从旁听过程中，我发现魏伯同志在每一次学习讨论前都带头认真做好发言准备，并善于提出问题，引导大家围绕中心内容深入开展学习讨论。他自己带头并要求高级组的每一个成员都要认真钻研经典著作，在领会精神实质的基础上联系实际，而不要漫无边际地东扯西拉。一次，高级

组学习讨论斯大林的著作《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时，一位副市长因为没有认真准备，发言不着要领，魏伯同志听了当即尖锐地指出：“我认为，要搞好我们的学习，严重的问题在于开动脑筋。”批评那位副市长在学习中没有认真开动脑筋。那位副市长以后对学习认真多了，发言水平明显提高。

三

魏伯同志留给我又一个深刻的印象是他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对干部和知识分子有非常浓厚诚挚的感情；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生活上关心他们的进步成长。就拿我们政研室的同志来说，当时大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人，虽然锐气可嘉，但毕竟是初出茅庐。魏伯同志经常耐心细致地给我们传授马列主义知识，帮助我们确立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具体指导我们如何观察、分析问题，帮助我们树立深入实际和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他还经常给我们讲革命传统，勉励我们：不论是在工作顺利情况还是在艰苦曲折的环境中都要经得起考验。他对我们的点滴进步和微小成绩都予以热情的鼓励，对在我们当中出现的值得注意的倾向，及时诚恳地给予指出。解放初期，物质条件很差，文娱体育设施缺乏。市政府行政科为了使魏市长能够在繁忙的工作中松弛一下头脑，活动一下筋骨，给他配了一副康乐棋。魏市长工作忙，很少使用，倒成了我们这帮年轻人的“专利品”。初学康乐棋，劲头大得很，有时到了深夜还“康啷！康啷”打个不停。住在政研室楼上的魏市长下楼来恳切地对我们说：“文娱活动要适度，不可玩物丧志啊！”听了魏市长的批评，我们再也没有深夜鏖战了。

最使我深受感动和终身难忘的是魏市长对我入党问题的关心。1952年市政研室已随魏市长从柳新街迁至景行路文巷天主教堂（今龙城路杂粮店位置）内办公，同市委政研室合并。市委书记陈枫调离柳州，由魏伯同志任市委书记兼市长。韦竞新同志由团市委书记调任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政研室主任，韦又是机关党支部的委员。一天魏伯同志在楼上问韦竞新同志：“严祖锐的入党问题还没有讨论吗？”韦回答说：“最近准备讨论了。”因为魏伯同志的声音宏亮，

我在楼下都听见了，不久，党支部召开大会讨论我的入党申请，以7票对6票通过。但组织部没有批准。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按照魏伯同志经常教导我们的那样去做，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经得起党组织的考验，不辜负魏伯同志的关怀和期望。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当时魏伯同志已调全国文联任党组副书记。我以无比兴奋和喜悦的心情给第一个关心我政治生命的好首长写了一封报喜信。没想到他那么快就给我回信，信中充满了诚挚感情和恳切的勉励。回信是这样写的：

祖锐同志：

经过长期的学习和锻炼，您终于成了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应为您祝贺，为党祝贺，在新时期长征途中增加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您过去已为党作了不少工作，入党后又有了新的条件，相信您会更好地为党工作的。不过这也只是新的起点，以后路更长，担子更重，要有这种思想准备，更加勤奋地学习，更加严格地在实践中要求自己，永不满足，永不停步，相信您也会这样做的。

何时来京，一定打电话给我，在一起好好谈谈。

耀东同志和小孩前请代致意。

匆匆，祝好。

魏伯

1·19

这些年来我一直把魏伯同志的这封信作为座右铭，不断激励我前进。我知道，魏伯同志关心干部、关心知识分子的事迹实在多得很。30多年后的今天，柳州市的一些老艺人、医务界、教育界、科技界的高级知识分子谈到魏市长是怎样关心他们的政治生命时，不少同志热泪盈眶。魏伯同志在广州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以及后来在北京任职期间，出差去广州、北京的同志去看望他时，他一个一个地询问所记得的在柳工作的每一个同志的工作、身体、思想近况，如××同志平反了吗？干什么工作？××同志入党问题解决了吗？等等，在柳工作的同志得知魏市长的关心都深受感动。魏伯同志与柳州市干部、知识分子的关系，不仅仅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是革命同志亲密无间的知

心挚友关系啊！

1979年某月，魏伯同志因公路过柳州，住在柳州饭店，我去看望他时谈到，柳州市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都很想念他，是不是通知一些同志来见见面。魏伯同志说：“好，就通知10多位同志在会客室里叙谈叙谈。”我按照魏伯同志的意见用电话通知了十多位同志。没料到，魏伯同志回柳州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许多虽然没有接到电话通知的同志也来了，会见时竟来了200多个同志，不得不把会见地点改在大会议室。我环顾一下会场，不仅柳州市50年代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来了，医务界、文艺界、教育界、科技界的知名人士差不多都到齐了。50年代初曾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蒙长兴和曾任市委宣传部科长的张慧文夫妻俩当时在鹿寨县境内的柳江造纸厂任职，听到魏伯同志来柳的消息，顾不上吃饭，急忙到饭堂要了几个馒头去搭火车赶来柳州，不错过这次难得见面机会。此情此景，不禁使人想到，一个具有崇高威望的党的领导干部，确像一块巨大的磁石一样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啊！

魏伯同志在柳主持工作期间曾经为可爱的柳州勾画出一幅又一幅美丽的蓝图，其中包括把柳州市建设成为广西重要的中心城市的设想和布局，以及市人民广场的建设，柳侯公园的扩建，柳堤和沿江大道和城市居民区的管道煤气建设等，限于时间和财力，这些蓝图在当时无法实现。经过近40年来历届领导带领全市人民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些蓝图正在一步一步地变为现实。当我看到龙城今日的崭新面貌，又不禁回忆起第一任市长——敬爱的魏伯同志。

思念永不断 ——追忆父亲魏伯

穆紫

父亲魏伯(王经川),于1984年7月18日,因病在北京走完了他的人生旅途。这一年,他70岁整。

在他近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以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党组织对他革命一生评价是:

“对党忠诚,顾全大局”;

“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工作极端负责,处理问题积极果断,作风深入扎实”;

“他严于律己,生活俭朴,不搞特殊化。他谦虚谨慎,虚心向下级请教,从不摆架子”;

“他待人诚恳,平易近人,总是替同志们着想,无微不至地关心、体谅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因而受到同志们的尊敬”。

这些评语是他为人一生的真实写照,毫无夸张之词。

他是我的父亲,更重要的是我做人的榜样、楷模。

自从投身革命以来,因工作的需要,父亲在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因党的需要,从事过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办过文学刊物,组织过抗日游击队、宣传队,从事过专业文艺创作、当过杂志的编辑、报纸的记者、地方行政领导、重工业的领导、经济部门、党的宣传部门、文学艺术部门的领导……党政军文他都干过。他生前的战友、同事都说他“文武双全”。

他每从事一个专业都是努力学习,兢兢业业,钻研业务,力求成为内行。

记得1955年,他作为武汉钢铁公司的生产经理,在鞍钢边实习生产业务,边作去苏联学习的准备。这段时间,他每天清晨学习朗读俄语,上班之余,还努力学习冶金建设生产的全过程知识,那时,他还买了计算尺、兰眼镜(看铁水钢水用的)等学习工具。

1971年，他从广东干校到北京，有关方面及领导曾有意请他出任北京钢铁学院的领导，谈话后，他立即找来毛主席关于教育理论的论述和英语读物，积极学习，以作赴任的准备。他每从事一样工作都特别认真，即使是在五七干校养猪，他也一样钻研，注意猪的生活规律、营养，调了饲料，所以他养的猪比别人的生长速度都快。

不但如此，只要能对党工作，他从不计较职位的高低。

1973年，他闲住在广州，曾托人转话给当时的广州市长梁湘，希望能给他安排点事情做，不计较职位高低，哪怕市里一个局长也可以。当时梁湘同志考虑到他在中南局已是副部长级地位，安排太低了未免不合适，所以没答应。

他生前最恨那些以权谋私、搞特殊化、搞不正之风的人。每当谈起这些人的行为，他总是痛心疾首。他一生俭朴，从衣、食、住、行到工作作风、待人接物，毫无铺张浮华。正像他生前的一些好友说的“像黄土高原似的粗犷、纯朴、厚实”。

家中的摆设，用物，依普通人的标准来衡量，也是极为普通。沙发、床、衣柜在他看来，就算是“过时”货。他去世后，我们清理衣物时，竟找不出几件高级的，稍好点的几件衣服，还是他50年代去苏联时做的。可是对待困难的亲戚和同志，他却慷慨大方。他自己的舅妈，孤寡一人，解放后一直由他按月邮寄生活费，直到去世。我们大舅妈及她的老母亲也一直由父母负担生活费用。现在父母已经去世，大舅妈的母亲也早在1979年去世，我们姐弟三人及小舅一家又承担起大舅妈的生活费用。

就是对一些陌生人，只要见人有困难也伸出友爱的双手。记得我们小时，在东北及广西时，遇见一些子女多的生人，总是把我们穿小了的衣服送给他们，有时还送一些食物。

父亲一生性格开朗、乐观、对人豁达，忠诚党的事业。数十年革命经历，风风雨雨，他屡遭坎坷。在延安抢救运动中，他被冤关押审查3年；在1959年反右倾时，又被错划为武钢“反党集团头子”；“文化大革命”中又一次遭批斗、绑架、关押、劳动改造，长达8年之久。用他的话讲，又一个“抗日战争”时间。尽管如此，也未动摇过对党的信念。而每次冤屈，他都相信迟早会被党理解的，迟早会弄明白的。

父亲为人最大优点是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待人接物不以职位高低，权势

大小而论。在人面前，他从不以领导者自居。他像一粒种子，撒到哪在哪发芽、生根、开花；他像柳树，插在什么样的土地上，都能适应。从家中警卫员、保姆到高级领导，他都一视同仁，凡别人有困难求到他，事无大小，他都尽力帮人解决。对待普通干部群众，他也经常主动关心，从工作、学习乃至个人生活问题。

记得 50 年代，那时在我家工作过的保姆，几年后，父亲总是设法为他们找一个立足的职业，以保证他们终身生活。1962 年，父亲原在武钢的秘书，随他调到广州中南局，没多久，父亲就帮他向组织上提出按政策解决他妻子及三个孩子由广西北海迁出的问题。问题解决后，全家由北海来到广州，一时，机关安排不了房子，父母即将他们一家五口安排住在我家楼下，并随我们一起吃饭。两个多月后，他们要搬到新分配的房子时，给母亲伙食费，父母坚决不要，只留了点粮票。事后，逢年过节，母亲还总是买了香烟及糕点，让我们送到他家。

父亲有个同乡同学，是武汉作家协会负责人，1958 年被划为右派，来到武汉东西湖农场劳动改造。1959 年的一天，他给在武钢工作的父亲来信，说农场围湖造田，他整天在寒冷的泥水里排泥，没有雨靴很不方便。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市场物资匮乏，父亲收到信后，即将他的一双劳保用的高筒雨靴让我寄给了这位同学。父亲去世后，这位长辈多次对我讲，那时，父亲不但不疏远他，还总是开导他，让他相信党，想开点，总有一天问题会得到解决的。另一位在广州造纸厂工作的同志也对我讲，“文化大革命”中，类似的话，父亲也经常对他讲过。

1983 年秋天，原广西壮族自治区一位负责同志，因工作调整，夫妻二人到北京中央组织部来谈工作，父亲知道后，让我和大弟弟买了东西去他们所住的招待所看望，并说，不要因为人家的职务变了就冷淡疏远。

“文化大革命”时，从干校回到广州的几年中，他闲住在家，还不断帮人解决工作调动问题、房子问题、冤假错案问题。

家中整天人来人往，尤其到了晚上。这些人当中多数是一般干部，也有工人、司机。其中有那么几个人，几乎每天来，似乎上父亲这来，已成为他们每天生活中的一件事。因为有时，他们来了并无什么事，甚至人多时，连话都说不上，仅仅坐坐而已。父亲去世后，有人告诉我，当时竟有几十人自发地到

车站为他送行。

1984年他去世前不久，还对柳州来看望他的同志讲，希望有关部门及领导关怀一下李方同志的入党问题，胡习恒同志的工作问题。他逝世前，住解放军三〇五医院。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跟病房里的大夫、护士相处得极为融洽。人们都很尊敬他，称他“魏老”。医务人员跟我们讲，他们医院住了不少领导干部，他们当中有些人，架子很大，治疗上的事、生活上的事都支使护士干。可是魏老很能体谅我们，生活上的事不到万不得已从不叫我们，生怕增加麻烦。因此，他与这些医务人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83年夏天，他病危，机关及家中已为他准备了后事。这时，医院的院长、内科主任、医生、护士请家人到医院，一再表示不惜一切力量延长父亲的生命，哪怕延长一分钟，也不放弃机会，并谈了他们的抢救措施。父亲在他们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终于又从死亡的边缘赢得了一年的生命，他再三表示，一定要感谢病房里的医务人员及院领导。

他是一个毅力坚强的人，很能克制自己。比如抽烟，一天能抽两包多，当医生劝他戒烟时，他能立即断掉，而不“藕断丝连”。1977年，他去广东韶关出差时，因雨天路滑，不慎摔了一跤，把右手腕折断了。当时在一个部队医院接上，回到广州一检查，接错了位。大夫对他讲，要么就这样，要么打断了重接，但这样很痛，一般人受不了。父亲听后，决定采用后一种治疗方法。于是，把即将长好的骨腕又打断重接，疼痛是可想而知的，可是家里人从来没听他哼过一声。他在逝世前，在病床上曾几次对我和我爱人要求提前结束生命，我想，他一定是被病痛折磨得无法忍受了才这样说的，我听后，如万箭穿心。尽管如此，可我们也没听到过他哼过一声，总是见他平静地、安详地闭目卧床，直到他告别人世而去。

父亲离我们而去七年了。七年中，我时时记住他的音容笑貌。平时吃到他喜欢吃的东西时想起他。甚至见到他的一些战友，我也总想他们跟父亲长得很像。看到、听到一些丑恶现象，就会想，父亲若在世，他肯定对这些会痛骂的，会生气的；想到这几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祖国建设事业飞跃发展，这些不正是他为之奋斗了一生所欲见到的吗？他真是去得太早了，太匆忙了！

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

——忆黎达愚同志

罗杰林

黎达愚同志逝世已经两年多了，他的音容笑貌一直留在我的心中，我们之间的交往情景，也一直记忆犹新。

我与黎老的相识，得追溯到解放前 1948 年。当时我刚从大学毕业出来，由党组织安排，在柳州龙城中学当教师。黎老是龙中的教师，我与他年龄悬殊，他比我长二十多岁。我们接触不多，见面点点头而已，可是他那朴实厚道的外貌、亲切和善的仪态，给了我很好的印象。后来听到同事们谈起他与船民的关系，加深了一层好感。黎老的家在对河窑埠，并在那里办了个小农场，每天他得坐渡船往返两岸。渡钱不多，可他常常是付给一张整钱而不要找补，而当他偶尔身上忘了带钱，或是过了摆渡时间，船民们也不向他索取，甚至单独为他一个人开船。

我与黎老结为生死之交，是在 1949 年 5 月间。黎老以他全家生命财产，掩护了我和妻子（地下党员、龙中教师唐美真）的安全。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5 月 19 日上午，地下党省工委紧急通知，根据确切情报，桂系特务到校从旁调查我的情况，为了以防万一，有必要抢在敌人动手之前，将我以及与我有关联的四个同志——毛恣观、丘行、方宏誉、唐美真撤离龙中，暂时隐蔽起来。一切按照上级的安排，当天晚上我们 5 人分头离开学校，消失在夜幕之中。

我与妻子唐美真同志为一路，到指定的地点——萝卜洲对面的沙滩上，与带路的同志会合。带路的梁山同志已经先到片刻了。他领着我们登上一只小艇，向对河窑埠划去。上岸后，我们走过一片菜地，进入一幢平房，这就是黎老的家。黎老见到我们，会意地点了一下头，显然组织上事前已经跟他联系好了，他已等候多时了。

黎老告诉我们，这里只住着他的老伴和最小的女儿。旁边屋子住的几个农场工人，多是家乡的子侄，全都老实可靠，还说刚才划船的两个青年，就是他

派去的，让我们尽管放心住下。

第二天一早，黎老主张，要在他的住房里挖个地窖，以防万一发生情况时，好让我们隐藏起来。锄头泥箕都准备好了，只等我们一齐动手。真是何等大胆的主意啊！要知道在当年，通“匪”或窝“匪”是与“匪”同罪的，为了完成党的委托，为了保护革命力量，黎老置自己乃至妻子幼女的生命财产于不顾。

我们当然不能接受黎老的这片好心。不管怎样，决不能连累他的一家。几经争辩、说服，最后议定白天我到柳江边上以游水为掩护，伺机而行，与城里的同志继续保持联系，继续坚持斗争，晚上到郊外睡觉。妻则认作黎老的远房侄女，留在他老伴身边。

深夜我悄悄地走出大门，不想黎老竟然跟了上来，坚持着非要陪同一块出去不可，怎样劝阻都没有用，这次轮到我让步了。他还叫两个工人，各人扛着一支七九步枪，装着打猎的样子，随后护送。就这样每天夜里，我们一行四人散开着走，在羊角山一带辗转，实在困了，就倒在草丛中睡上一觉。山上蚊子极多，直往耳朵鼻孔里钻，说是睡觉，实际只能瞌上一眼。可是为了不打扰对方，大家都装成安然熟睡的样子。后来黎老进城特意用高价买回一瓶美制防蚊油，基本上解决了睡觉问题。

一个晚上，四周漆黑，黎老在前面带路，走着走着，只听扑通一声，掉进坑里了，这时我什么也来不及想，跟着飞身跳下去扶他。原来这是抗战时期日机留下的炸弹坑，一米多深，坑里长满了野草和荆棘，不留意是不容易发觉的。我们的脸部手臂和脚踝被划破多处，幸亏没有伤到筋骨。这一摔，睡意全没了，两人索性挨着坐在坑里，细声叙谈，直到东方发白。

白天，黎老照常到学校授课，晚上陪同我一道上山隐蔽，紧张的生活连续了一个多星期。我年轻能睡挺得住，黎老明显地瘦了下来，可是在我们面前，他从没表现出半点困倦的样子。而这时伪街长的身影频繁出现在窑埠的街头巷尾，因为此刻柳州城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寻师运动，地下党利用我们5人被迫出走，变被动为主动，发动群众，向伪政府要人。龙城中学成立了寻师委员会，登报呼吁“还我老师”，博得社会人士广泛同情，一时间搞得敌人昏头转向。反动当局是不会就此罢休的，伪街长的活动就是个讯号，他们在四处搜捕我们

哩。这时组织上再次决定，要我们立即第二次转移。临别时，黎老一家依依不舍，他的老伴抱歉地说没有招待好我们的吃和住，过意不去。抱歉的应该是我们，看着黎老憔悴的面孔，我无言以对，有什么语言能够表达对这一家如此深情厚谊的谢意呢！

8月中旬，我们奉命离开柳州，前往梧州，担负解放城市的准备工作。解放后方才知道，就在我们离开窑埠的当天中午，伪街长直闯黎老的家，东瞧瞧，西看看，查遍了每个角落，农场的四周也散布着许多陌生人，结果一无所获，悻悻地走了。此人镇反时被镇压。

解放后的50年代，黎老出任柳州市副市长，柳州市民革主委，我在区党委统战部工作。旧的友谊加上新的业务关系，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经常促膝谈心。我知道他迫切要求入党，从感情上说，我高兴他能遂了自己的心愿，可是由于工作的需要，组织上认为他留在党外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经过说明黎老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参加民革，并担任主委职务。在职期间，他代表民主党派，与柳州市党委共同议政，互相监督，做到很好的合作。

50年代后期，我调离统战部，接着下乡搞“四清”运动，再接着是到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一晃十多年，我们没有见面，也中断了通讯联系。

1970年我获得“解放”，挈妻携子全家一锅端，下放柳州地区。安顿好了吃和住，第一件事便是打听黎老的消息。谢天谢地黎老人健在，但是尚未获得“解放”。人在就好，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星期天一早，准备了一点微薄的礼物，带领着5个儿子，浩浩荡荡地去看望他老人家。一路上我指指点点，将当年龙中出走，窑埠避难的实情实景讲给儿子们听，重温往事，我怎么也想不通一位与党有着血肉联系的老人，如今竟被当成敌人，等待着第二次“解放”。

大队人马的突然到来，出乎黎老意料之外。一见面，他欣喜得简直有点手足无措。过了一阵，面带难色地说：“你们敢来看我，我并没有解放呢！”原来黎老在为我们担忧，怕政治上连累我们。确实，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无限上纲，株连一大片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黎老一如既往，在自己身处逆境的情况下，仍然顾及着他人的安危。我正色对他说：“二十年前你连丢

脑袋都不怕，今天我会怕受连累吗？”经过一再表态，他才安下心来。这一天我们谈了许多、许多。谈到彼此被批斗受辱的情况，谈到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特别令人既气愤又喷饭的是，黎老解放前多次掩护地下党的同志，竟然也成了他的罪状之一。造反派的原话是：为什么这么多走资派、叛徒、特务、假党员都跑到你那里隐蔽，你与他们是什么关系？黎老说他始终相信我们这些人都是好人，毫不后悔当时做过的一切。正因为他坚持了正义，不肯在同志们脸上抹黑，而激怒了造反派，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批斗。

黎老说他相信党，相信同志，相信自己，尽管处境恶劣，可思想没有负担，心中坦然踏实。他一直是乐哈哈的，甚至说到受辱的时候，也是长者对后辈的宽厚口吻。他带我们参观他的菜园，看他养的鸡群，样样东西打理得整整齐齐，有条不紊。确实，没有无私的情操和坦荡胸怀的人，是不能做到这点的。那一天，他宰杀自己养的肥鸡招待我们。

黎老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每天步行到市里参加学习班，无休止的检查交待，过度劳累病倒了。我知道后，设法从单位要了辆车，接他进城看病。车开到沿江马路时，远远看到他正由大女儿黎鲁非搀扶着，缓缓向前行进，我让他上车，他推辞不肯，原因仍然是自己还没有“解放”，怕在公开场合出现，对我影响不好。我心里一阵酸楚，鲁非忍不住掉下泪来。人都病倒了，还一味为他人着想。我不管这么多，硬将他拉上车。我告诉他，市革委再次派人外调，我和唐都写了实事求是的证明材料，估计我们这些“走资派”陆续“解放”了，材料是能起作用的，他的“解放”是有希望的，况且真金不怕火炼。我还半开玩笑地说，解放前你与共产党员有过生死相连的关系，“文化大革命”中又经受共同受辱的考验，看来光荣同享的日子不会远了。黎老点头称是。我们四只手紧握在一起，很久不松开。

1971年黎老果然“解放”了，但还没有恢复原来的职务。可是只要一有工作，他就积极去完成，全然不顾老之已至。为了上班的方便，他搬到市区里住。当年在“先治坡、后治窝”的思想支配下，干部的住房条件相当艰苦，黎老分在一幢六层楼上一个套间，楼梯狭窄阴暗，白天也要摸着上下，他没有强调困难，要求更换。他老伴患了重病，黎老精心照顾料理，尽最大力量请医

生抢救。一天，当请来的医务人员爬上楼去时，老伴已经停止了呼吸，静静地离开了人世。那是一位和善淳朴、与人无争的劳动妇女。

黎老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位光荣的正式共产党员，逝世前，预嘱家人将抚恤费全部交作党费，不留骨灰，丧事从简。

1987年11月24日黎达愚同志逝世的噩耗传来，当时我在医院留医，不顾医生的劝阻，和美真同志立即赶赴柳州，沉痛悼念挚诚的战友。用今天的话来说，从组织与组织的关系讲，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从个人的关系讲，我与黎老也称上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样深厚的情谊是永恒的、不灭的。

(原载《柳州党史资料》第17期)

秋枫向日红

——记解放战争时期的高天骥

刘明文

1946年至1949年，我在柳州私立龙城中学求学，1948年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高天骥是龙中校长，兼任过我班的英语教师。1982年我调到中共柳州市委党史办工作后，曾多次访问高天骥并帮他整理了回忆录《争取秦镇等人投诚情况》和《保卫城市，支援前线》。本办干部刘彦云和黄耀荣访问了熟知高天骥情况的马伟、方宏誉、胡习恒、曾少庆、丘行、沈章平、李立民等同志，还查阅了有关的档案资料。在纪念广西解放40周年的时候，特整理这份史料，以寄托对老校长的哀思。

—

1946年，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为广西的4所私立中学颁发的教学成绩优良奖状名单中，首榜就是高天骥创办的柳州龙城中学。龙城中学和高天骥的声誉，传遍全省。可是到了1949年下半年，高天骥和龙中却遭到厄运。8月，省政府撤了高天骥的校长职务。接着，又在9月14日下令解散龙中。“罪名”均是高天骥与龙中“历年底纵匪党，策动不法活动，败坏校风，淆惑人心，破坏戡乱建国事业”。反动派下一步的目标，将是置高天骥于死地而后快，高天骥已置于特务严密监视之中。9月18日傍晚，中共柳州城工委派党员曾少庆、黄维光、明乐将高天骥从虎口救出，先后转移到鹧鸪江和雒容县丹竹乡岩面屯隐蔽活动。

高天骥被撤职和龙中被解散，亲者痛，仇者快。柳州城的特务报纸，连续抛出《树倒猢猻散》《擒贼先擒王》《龙中恶贯满盈》等社论和杂文，对高天骥和龙中进行围剿。反动派给高天骥和龙中党组织的“罪行”，恰恰是高天骥和龙中党组织光荣的、正义的革命行动。

解放战争时期，高天骥先后聘任了马伟、陈光、侯信、梁华新、曾少庆、姚冕光、罗杰林、毛恣观、丘行、方宏誉、王少白、沈章平等 30 多名共产党员和黎达愚、王明初等 10 多位进步人士为龙中教职员。原属广东粤桂边特委领导的柳州特支机关设在龙中，属中共广西省工委领导的柳州县委也在龙中建立了党组织，前后共发展了学生党员 26 名，爱青会员和学联会员数十名。敌特要逮捕的王明初、姚冕光、马伟、方宏誉等人，都因高天骥“泄露机密”而“漏网”，甚至连后来远在忻城工作的地下党员梁华新，也因得到高天骥的报警而幸免于难。1946 年 3 月 29 日，高天骥接受王明初（30 年代的共青团员，1949 年在广东打游击时牺牲）的意见，拒绝带领全校师生参加国民党和三青团联合举行的全市青年反共大会，接着，又坚决拒绝国民党、三青团在龙中搞党、团员总登记。全面内战爆发后，柳州全城到处是“剿灭共匪”“戡乱建国”的标语，而龙中却没有。有的是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壁报。城里到处传唱“今朝有酒今朝醉”之类靡靡之音，而龙中学生唱的却是《茶馆小调》《古怪歌》《山那边哟好地方》《团结就是力量》等反美反蒋的歌曲；演出的是解放区歌剧《兄妹开荒》和活报剧《你这个坏东西》。1949 年 5 月，当龙中的地下党组织散发传单被敌特侦悉的时候，身为“柳州市学生运动分组”（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的组织，各中学校长被指定为该组组员）成员的高天骥，不仅没有“引咎自责”，反而在学运分组召开的紧急会议上“狡辩”：“过去本校有二学生因无意中用共党之传单包物，至实用会计校遗落下地，被人发觉，遂误传为龙中有大量的反动宣传印刷品，主持人为高天骥，闹一满城风雨……本人在柳的行动为多数人所深悉，不须详细辩明，自有公论。”（摘录自敌伪档案《柳州市学运分组会报记录》）军统、中统、桂系多次向龙中推荐“老师”，以便安“钉子”，高天骥在马伟、方宏誉、曾少庆等地下党员“参谋”下，有的让其进来后而孤立之，有的只给他做个把学期便“礼送”出校。高天骥是柳州头面人物之一，社交很广，他的亲戚朋友中，富商、豪绅、军统各色人物都有。他就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打听敌人的情报，转告马伟和方宏誉等人。为了防备反动派对龙中的突袭，高天骥买了 13 条枪，组织武装护校，他将枪支发给地下党员曾少庆、沈章平、胡敬之和民主人士李立民、赖德昭等可靠的教职工，

万一发生事变，实行武装拒捕，潜渡柳江，奔赴柳北游击区。1949年4月，方宏誉受党指示，介绍高天骥参加党的外围群众组织——广西民主人士联合会，同年9月，高天骥在农村隐蔽活动期间，会见了地下党省城工委书记陈枫和柳州城工委委员胡习恒。高天骥激动而恳切地说：“反动派把我逼上‘梁山’，我要和你们做同生共死的同志和战友，不能留在党外当朋友了，请党组织批准我加入党的行列！”在陈枫的同意下，胡习恒代表城工委表示欢迎，而且愿意做他的入党介绍人，答应回城后办理入党手续（柳州解放后城工委于12月14日为高天骥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当时高天骥见地下党缺少活动经费和武器，立即写信派人回家要了800元银毫交给党，还把身上的两支手枪交出来作为保卫党领导机关之用。

二

高天骥从一个党外民主人士成为共产党员，经历了一段痛苦而曲折的过程。他是柳州市人，1910年出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在旧桂系时期，其父曾任广州少将城防司令。高天骥青少年时代在香港、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求学。在上海读书期间，他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秋，他从上海大夏大学毕业，抱着教育救国的思想，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说服母亲捐资献产，与地方人士合作创办了龙城中学。他是一个爱国者，亲自带领龙中师生到农村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还担任过柳州文化界抗敌救亡协会理事长和救亡剧团团长，为抗日救亡运动奔走呼号。年轻气盛、闯劲十足的高天骥还跻身政界，一度当上了三青团柳江分团部筹备主任和柳州日报社长。他踌躇满志，以为龙中的前途和个人的名誉地位可以“青云直上”。事实恰恰相反，在国民党各派系权力斗争的激烈角逐中，高天骥不仅丢官弃职，连龙中的校舍也被国民党军队强占为伤兵医院。他为龙中寻找财源而苦心经营的珠江木业公司的2万多棵树木，也被国民党军第四战区长官部封存征用。在日本侵略军占领柳州期间，也目睹了国民党军队的溃败，达官贵人趁战乱大发国难财，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一心效忠的“党国”如此腐败，对他如此冷酷无情，他迷惘了，他

愤怒了。可是没有找到明确的出路，他对蒋介石集团失望了，但仍对国民党的某一个派系抱有幻想。正当高天骥在政治上感到痛苦和徬徨的时候，全国解放战争的革命形势教育了他，学校里工作起来像一团火一样的进步教师们的献身精神鼓舞了他，使他振作起来。他要寻求真理，他要奔向光明。为了听到共产党的声音，他买了一台收音机交给党员教师胡敬之保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和方宏誉、胡敬之在一起收听新华社的广播。《将革命进行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毛主席的文章，犹如甘露滋润了他的心田，似火炬照亮了他前进的道路。高天骥终于明白了，光搞教育救不了国，只有跟共产党闹革命才能救中国。他向方宏誉表示了倾向革命的心愿。方宏誉因势利导，介绍他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过去他仅凭正义感和一种复仇的心理（因为他饱受国民党的排挤和打击）去办学和同情支持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现在，他以一个革命战士的身份自觉地参加革命斗争。高天骥参加革命后，毅然地抛弃了富有和温暖的家庭生活，冒着杀头的危险，到深山野岭吃苦受累，开展迎接解放的斗争。他为此感到无比光荣，兴奋地到岩面屯的桐林中吟起诗来：

山城枭獍恶，我夜走无踪；寄迹岩面下，长吟桐林中。

落叶迎风舞，秋枫向日红；柳洛隔咫尺，山川竟千重。

倒悬指日解，何为患蹙穷；欲知大军讯，勤听北山风。

解放后，高天骥在《我的简历》《关于我与地下党的关系》两份材料中对自己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作了记述：从1945年7月至1949年9月，“我一直不断与进步教师包括地下党员接近，并由一般共同办学的感情逐步达到趋向进步政治感情，与他们团结无间，相共安危，共同维护龙中的安全和发展。在他们的影响下，使自己对当时的革命形势逐步有所认识，个人思想有所提高。同情他们反对蒋介石匪帮所执行的独裁和打内战的反革命政策的观点，同意他们在学校墙报上、讲课中所反映的革命主张，支持他们在学生中进行革命知识的灌输和培养，接受他们的建议在校内实行民主教育，在学校行政管理上采取一些民主措施……”“1949年三四月间，在方宏誉与我的一次谈话中，初步转入和地下党发生组织上的关系。在这次谈话中，我表明了

要参加组织干革命的要求……”高天骥还在《诉衷情》的这首诗中，表露了他和反动统治阶级彻底决裂和革命到底的信念：“朱门酒肉屣庖厨，饿殍暴通途。凛然怒目以对，宣教聚生徒。传马列，警顽夫，斗城孤。持枪举义，为拯庶民，何惜头颅。”

三

高天骥在深山老林中盼望“落叶避风舞，秋枫向日红”的日子终于来到了。1949年11月25日，柳州解放了。高天骥以无比喜悦的心情和热忱，投入了维护社会治安和接管城市建立人民政权的工作。解放初期，他先后担任柳州市人民临时治安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等职务。龙城中学在解放后的第6天复校上课。党在龙中多年培育的革命种子开了花结了果，成百名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爱青会员、学联会员输送到党政机关和部队去工作。高天骥积极协助党和政府去团结与教育原国民党的中、上层人士和地方士绅，争取了国民党柳州警备司令秦镇、雒容县县长王公晋向人民投诚。1953年以后，高天骥调到自治区从事文化教育和体育运动工作。由于他成绩卓著，荣获新中国体育开拓者金质奖章。1985年10月24日，他走完了生命的旅程，终年75岁。10月29日，在柳州市殡仪馆举行的向高天骥遗体告别仪式上，自治区体委负责人介绍了高天骥的生平，他说：“高天骥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追求进步的一生；他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抛弃旧我，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不愧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龙中校友会给高天骥送了挽联：“缅君兴校勋劳，创业维艰，袍泽亲情深柳水；痛我明师殒谢，哲人其萎，生徒哀思满龙城。”

（原载《柳州党史资料》第17期）

革命烈士 (新民主主义时期)

刘明文

张胆烈士 (1905-1927)

福建省顺昌县人，字芸生。1925年在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1926年以国民党党员身份任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农民部秘书。同年7月，受中共南宁地委派遣，以国民党党务指导员身份到柳州工作，配合先期到柳的共产党员陈岳秀、罗琴谱开展建党活动。张胆一到柳州，便领导省立四中学生非基督教同盟和柳江学生联合会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共柳州支部干事会成立后，张胆任组织干事。同年10月，共青团柳州支部成立，张胆兼任书记。张胆擅长宣传鼓动和统战工作，曾深入柳城、融县、象县、柳江等县指导农民运动和青年运动。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张胆被捕，9月1日就义于南宁。

熊秀民烈士 (1898-1927)

柳江县成团乡人，壮族，字朝栋。1925年5月在梧州国民党宣传员养成所学习，接受共产党员教官谭寿林、毛简青的教育，成为国民党左派分子。回乡后开展农民运动。1926年10月任国民党马平县（即柳州旧称）党部青年部部长。同年冬加入共产党，后任国民党柳庆党务整理处党员特别训练班教官，还奉派到河池、宜山等地开展革命运动。1927年8月在宜山被捕，押回柳州下狱，坚贞不屈，慷慨赴死，同年10月被国民党杀害于更新亭（今三中路口）。

刘策奇烈士 (1895-1927)

象州县人，又名嘯真，中共柳州支部的首批党员。1925年5月在梧州国民党宣传员养成所学习，受到共产党员教官的教育。他在梧州《民国日报》发表《广西青年的切要问题》《干、干、干！》等文章，主张反帝反封建，实行国民革命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结业后回到象州组织革命青年社，与地方上的反动势力作斗争。刘策奇是个优秀的民俗学专家，对广西少数民族的历史、语言、风俗有深入的研究，他的著作多次在北京大学的学报发表，《鲁迅全集》亦载有他与鲁迅的通信。1926年冬，张胆邀他到柳州工作，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国民党特别训练班任教官，讲授革命运动史。1927年9月他带领一批学员到南宁工作时被捕，经亲友保释出狱后仍坚持革命斗争，遂二次被捕，12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陶保桓烈士 (1910 — 1937)

融水苗族自治县人，原名陶保康。17岁在家乡读小学时，参加了中共柳州支部领导的外围组织“革命青年社”。1933年在桂林就读广西师范专科学校，受到共产党员教师的教育，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一二·九”运动和“六·一”运动。陶保桓与一些进步同学秘密发起组织“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领导进步同学与学校的托洛斯基主义势力进行斗争。193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桂林特支书记和桂林县委委员。1937年3月中共广西省工委派他到柳州恢复重建党组织，任中共柳州支部书记，他以省立柳中（今柳高）教师职业为掩护，在柳中和沙塘农学院校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组织。他积极领导了柳中的反对托派言论的斗争和柳州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因此遭到桂系军阀的忌恨，遂于1937年8月31日将他逮捕投入桂林监狱。他遭受酷刑，四肢被打断，遍体鳞伤，但他坚贞不屈，9月17日被桂系军阀杀害于桂林，用生命和鲜血保守了党的秘密和党组织的安全。

赵素娥烈士 (1921-1941)

柳州市中山东路人，女，别名艾侠。1937年在柳中读书，积极参加中共柳州支部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反托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投笔从戎，随广西学生军开赴安徽六安、合肥前线，从事战地救护等工作。在此期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0年春，奉党组织指示转移到新四军工作。同年11月她随刘少奇率领的“乌江大队”来到江苏省盐城地区开辟工作。担任了民运工作队队长，发动群众与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伪军进行斗争。1941年6月，赵素娥任中共十三区委委员。7月反“扫荡”时不幸被敌伪军俘虏。伪军师长徐绍南对她软硬兼施，逼她投降。赵素娥坚贞不屈，高唱《国际歌》表明自己的革命气节。恼羞成怒的敌人无计可施，遂于11月初将她活埋。

陈守善烈士 (1921-1947)

柳州市人，女，别名辛文。与赵素娥烈士是同学和战友。1938年春，随广西学生军到达安徽大别山区，参加了中共鄂豫皖区委的地下组织。入党后改名辛文，她擅长演讲、演戏、唱歌和新闻报道。1940年初，她正式参加新四军，先后在江苏省盐城、淮海地区从事民运和新闻工作，任《淮海报》记者。1942年夏，任涟水县敌工部部长，经常化装为农妇深入敌占区进行策反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又破坏和平谈判，内战全面爆发。她随军转战沂蒙山区。1947年4月，她参加了华东野战军全歼国民党王牌军整编74师的孟良崮战役。因积劳成疾住院治疗。在一次国民党飞机轰炸时牺牲。

侯信烈士 (1919-1949)

柳城县太平乡人，又名侯骏驹。1938年底参加广西学生军，在南宁、武鸣一带做战地动员和锄奸工作。194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以后，到柳城、全州等地活动。1944年秋，日军攻占柳州，他到罗城参加柳州日报社地

下党组织领导的抗日工作。1946年春，在柳州私立龙城中学任教务处干事，任中共柳州特支组织委员，积极参与领导柳州学生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民主运动。同年冬转移到贺县工作。尔后回到柳北地区活动。1948年10月，他与其他同志一道成立了柳北地区的第一支武工队，并任队长。随着武装力量不断壮大，他先后任桂黔边人民保卫团第二大队大队长、柳北人民解放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他在游击战争中，多次带领部队奇袭敌人和粉碎敌人的“围剿”。1949年11月15日在解放太平圩的战斗中，他带领战士冲锋时中弹牺牲。

贺智华烈士（1930-1949）

柳州市人，原籍湖南，女。1944年秋，柳州被日本侵略军攻占，她家疏散在成团乡避难。不久，成团乡亦沦陷。她在哥哥、姐姐的带领下参加抗日活动。一次，她和姐姐贺莉华化装进入成团圩场，秘密运送枪支给游击队员，打死了日军军官曹开川。1946年，贺智华就读龙城中学，在学校地下党组织的教育培养下，参加革命文学社团“奔流社”，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反对美帝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后来被党吸收为爱国民主青年会会员。1949年2月，受党组织派遣参加中共上折工委领导的农村武装斗争。她先后在忻城县冷水、果后、龙锁等村庄，从事妇女、儿童、宣传工作。5月25日，都宜忻人民解放总队某部在大塘附近的稀饭坳与国民党军队激战，贺智华中弹光荣牺牲。

记著名国画家邓俊群

方贵益

邓俊群，号梅谷、六然。原籍广西融水县，后迁居柳州。1906年出生，1934年毕业于上海美专。他从事国画和书法逾半世纪之久，经验丰富，艺术精湛，是著名国画家。曾任前广西桂林美专国画系教授、柳州市六中美术教师（1973年退休）、广西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书画函授大学柳州分校顾问、柳州画院顾问。他是柳州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他擅长绘画梅、兰、竹、菊、松、鹤、鸡、鹰、猫、马、鱼、虾、蟹、山、水等等。所绘形象，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尤其画梅，生动逼真，活现纸上，因有“画梅圣手”之称。而尤为难能可贵者，是对水墨之运用，能一笔六彩，堪称“丹青妙手”，有“八大山人”之神韵，突出国画传统之功力，独具一家艺术风格。《光明日报》评论其作品称：画竹节能园，竹节发亮，超过前人；画梅也具特色，笔墨变化无穷，耐人寻味；画鱼、虾、松、鹤，极为生动，别具心裁。他能题诗，且擅书法，堪称诗、书、画三绝。

他在上海美专时，得我国著名画家刘海粟校长的教导，诚所谓有名师必有高徒，为他日后打下创作和成名的基础。

他于1941年与友人、名画家马万里等创办桂林榕门美术专科学校，推举马万里为校长。时值抗日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物价飞涨、币值低落、金融混乱、人心惶惶，教师、经费、校址、校舍均得之不易。但由于他对国画经验丰富，造诣精深，在艺术界及社会上均颇有声誉而争取得到各方支援，并一面作画筹集资金，终能建成第一所美专，开广西历史上创办美术专科学校之先河。培育造就美术人才甚众。

他当时任国画系教授，对学生讲授用笔墨的技巧，求灵活变化，破除呆板古法，教学生在传统中突出新意境。当时就读者，多能脱颖而出，并独立作业。因而甚得马校长所器重和学生爱戴。

1956年，他作《鱼峰与龙潭之新气象》一幅，获选入全国第二届国画展览会展出，后参加广西第一届国画展览，被评为优等作品奖，载入《优秀国画作品纪念册》。此画现为广西博物馆所珍藏。

1980年，民族友谊画苑特邀请他带作品去北京展销，他的作品备受外宾赏购。同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来柳为他拍摄书画生涯纪录片，题为《水墨丹青》。他即席表演的国画老梅、葡萄、鱼虾和草书“龙飞凤舞”4个大字收入镜头，嗣后在国内外放映，颇得观众称赞。

在1983年，桂林博物馆展销他的作品《鹤立鸡群》时，日本客人以15万日元购买。他的书画深受国内外艺术爱好者和收藏家所欢迎。

1985年春，柳州市博物馆等单位，曾联合举办他个人的书画义卖展览，他所得画酬，全部奉献给修筑柳堤和设立“六然书画苑”之用。

1987年4月25日，由广西区文史研究馆主办的滇、川、黔、桂四省区及渝、沪两市书画联展，在南宁广西博物馆开幕展出，作品共320余幅，作者200余人，多是已有四五十年经验的老书画家。邓老人选四幅，此中有2.7×1.8公尺的巨幅20鹤苍松画，其画幅之大，是居所展出的书画中首屈一指者。其布局极为壮观，所画亦甚生动，堪称难得佳作，吸引众多观众观赏。

是月27日在广西军区招待所，由区馆号召各参展者进行书画表演，邓老表演敏捷画竹，每20-30分钟创作一幅，且生动逼真，参观者甚为惊叹，忽有许多艺术爱好者持纸来请他赐画，即席许之。

出席联展的全体人员，于同月29日赴桂林参观并开笔会，他曾题诗四首：

聆四川重庆代表程同志发言感咏
聆君高论适吾心，古法相承是识音；
发展精华传后代，光辉灿烂世人钦。

书画联展观感

文史由来盛著功，西南省市汇相通；
佳书佳画同联展，丰富文明四化隆。

在联展座谈会上

馆员代表汇邕州，欣见西南气象稠；

联展诗书新画作，各彩风彩映千秋。

泛舟漓江

欣泛漓江碧水舟，万里从翠焕风流；

合将诗句联成韵，付与骚坛雅唱酬。

笔者亦得参加联展开会观摩，后来又随同邓老游七星岩及七星公园。当时他虽已达耄耋之年，惟精神矍铄，步履尚健，游兴甚浓，于七星公园内曾与他摄影留念。

同年6月14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第二次来柳为他拍摄画大竹的纪录片，题为《柳州印象录》，后来于国内外发行放映。

邓老除长于书画外，复工于诗。他著有《清风集》七十九卷，作诗二万余首。这是他老人家50多年来智慧的结晶。诗句多为题画和感怀。现为他故乡融水县县志部门所复印和珍藏。其书法墨宝，在桂林西山、象鼻山和柳州都乐岩等风景名胜处，有立碑刻石多处，其笔法潇洒，苍劲端庄流畅。

同年，中国函授大学（浙江）宁波分校编纂《中国当代名画家辞典》，收入邓老的作品和个人的中、英文自传，向国内外发行。

邓老为继续和发扬祖国的书画艺术传统，穷毕生之精力。他曾到各地培育大量书画人才，如永福县之何道德，桂林之梁寄尧、唐道昌，南宁之罗鼎华、马慧仙（女）等，均已成为画家。他一生为祖国文化作出无私的奉献。他态度和藹，平易近人。他治学严谨，淡泊名利，生活朴素。1990年1月26日，因患脑溢血经医院多方抢救无效，于柳州与世长辞，享年85岁。

回忆父亲肖甘牛

肖丁三

我的父亲肖甘牛离开人世已有八个年头了，可他酷爱文学的精神和艰辛的创作生活情景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并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父亲原名肖钟棠，后因追随鲁迅的文学事业，甘愿作人民的“牛”，故按鲁迅的诗句“俯首甘为孺子牛”而取笔名甘牛。父亲是广西桂林永福县人，1905年出生，壮族。祖父是教师。祖母善于唱歌又善讲故事。祖父创办桂岑民族师范学校，教师学生来自十多个民族，父亲在家庭和学校的影下，自幼就深深地爱上了少数民族文学。

父亲从小爱听奶奶讲故事，并且爱写故事。他在桂岑师范读书期间，就开始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并常到小学去给学生讲故事。

我的母亲潘平元也爱好文学，尤其爱听爱写故事，常常和父亲一道下农村去搜集整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料。在父亲漫长的文学生涯中，母亲不但是他的贤内助，而且是他终身的文学伴侣。父亲和母亲曾合作搜集整理出版民间故事集。

1929年，父亲随祖父到平乐中学任文学教师，并到平乐小学去兼课。这期间他经常给全校师生讲述生动而有意义的民间故事，给学生唱儿歌和民歌，还辅导学生讲故事、写故事。

为了教学和收集整理民间文学以及创作需要，父亲刻苦攻读语文，特别是语法。在上海文学院学习这段期间，撰写《中国学词辨正》和《中国修辞学讲话》，由上海春光书局出版。

1934年，父亲大学毕业荣获文学博士学位，回到广西梧州中学任教，并参加《梧州日报》的《春溪》文艺副刊工作。后因副刊内容切弊及国民党梧州政府，难以继任而被迫转桂林中学任教。

抗日战争期间，父亲看到一批一批少年儿童从各地疏散到桂林的悲惨情景，

熬了几个不眠之夜，写了儿童剧《孩子流亡曲》《家在哪里》《流浪儿》；亲自导演，还带领学生到街头街尾给苦难的孩子们演出。有的感动得泪珠滚滚，有的甚至扑在妈妈怀里放声痛哭。

在这期间，父亲常利用寒暑假深入苗山瑶寨采风，搜集了大量的民间文学资料。他还渡过海峡，到台湾高山族人民聚居的地方搜集高山族民间文学资料，解放后出版了高山族民间故事集《日月潭》《椰姑娘》《浊水溪》《台湾民间故事集》（与母亲合作）。

解放初期，他主动申请并获上级批准到桂北瑶族地区参加土地改革工作，这期间作了诗歌《刘付生诉苦歌》，由土改办公室印发到各地区宣传，对进行阶级教育推动土改运动起到很好的作用。

土改结束后，父亲又要求到少数民族聚居的来宾、大圩、宜山等地任教。在这里三年时间里，他边教书边进行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发表了大量的各族民间故事，出版了《宝盖山》《长发妹》《铜鼓老爹》《刘三姐》等民间文学集子。其中《刘三姐》是我和父亲合作。我还清楚地记得，1955年冬，我和父亲顶寒风冒冷雨到刘三姐家乡——宜山下枳村采风，时大路泥泞，难于行走，父亲几乎跌成一个泥人，可他仍然精神抖擞地前进。到了下枳已是暮色苍茫，他换上干衣，饭也顾不上吃就访东家走西家。吃过晚饭，已经午夜，奔走了一天，累得精疲力竭，刚脱下衣服正要上床休息，忽然听隔壁韦老爹说，下枳河边有座小石山，山下有一长石条，传说是三姐和小牛到那里砍柴时挑断的扁担化成的。父亲听了很高兴，立刻穿上衣服，打亮手电筒叫我去一起去看。我说明天再去，父亲却说：“抢救民间文学，就要分秒必争呵！”说完，匆匆地走了。我在后面紧紧跟着，回来已经是凌晨两点多钟。两个月以后，父亲在病床上编写桂剧《刘三姐》，不久与宜山观众见面了。半年后，我们父子共同整理的民间故事《刘三姐》由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

由于父亲对民族文学的酷爱，1956年春，毅然辞去教师职务，带着全家迁入苗、壮、瑶、汉同胞聚居的大苗山区落户当农民。他穿上少数民族服装，和少数民族同胞一道伐木、种田、走寨、坐火塘。

在深山老林中生活的日子里，他曾多次迷路未归，爬上大树枝丫度过寒冷

的夜晚；也曾经掉进山沟被山蚂蚱咬得两腿流血。不知多少个夜晚，他蹲在火塘边，映着火塘里一闪一烁的光亮，记录老人们唱的民歌和讲的故事，直至深夜。他常常是躺在火塘边的稻草堆上睡着的。

在深山老林里，父亲常遭到毒蛇猛兽的袭击，有一天，几个苗族儿童拿着猎枪带着我和父亲去采风，途经老林，突然，从山洞里窜出一头山猪。一苗童立刻命令伙伴们隐蔽，叫我和父亲爬上树去。山猪走近了，众枪齐鸣，山猪被打伤，疯狂地向我和父亲扑来，窜到树下，用嘴不停地拱着树兜。父亲叫我不害怕，他脱下身上的单衣，向山猪丢去，衣服蒙住了它的眼睛，跌跌撞撞地摇摆着。这时，小猎手已装好第二枪火药，“呼”的一声，山猪倒在地上挣扎。父亲跳下树来，拿起钢叉，对准山猪头，“咔嚓”一声，山猪踢了两下，躺在血泊中不动了。一年以后，父亲写成儿童文学小说《打山猪》由上海少儿出版社出版。接着又出版了《龙牙颗颗钉满天》《红水河》故事集及挽救了日本妇女北鸟岁枝和两个孩子生命、引起国内外轰动的苗族民间故事《灯花》。

1957年，父亲加入了中南作家协会、广西文联，还当选为广西政协委员。

1957年至1958年，父亲以惊人的速度连续出版了民歌集《大苗山情歌集》《哈迈》《双棺岩》《苗山走寨歌》《眼泪河》。民间故事集《大苗山民间故事》《亮眼宝石》，散文集《香香的集子万年长》，传记故事集《韦拔群和瑶族人民》，桂剧《一幅壮锦》。

1959年，父亲虽身体不佳，可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创作。这一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出版了散文游记集《采风小记》《壮锦里的花纹》，小说《深山探宝》，并完成了电影文学剧本《一幅壮锦》，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摄，获得全国电影优秀剧本奖和1965年的卡罗维·发利第十二届国际电影荣誉奖。他创作的《金耳环和铁锄头》也在这一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动画片。

由于父亲创作的成果显著，这一年，他被吸收为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并担任广西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

1959年，父亲应邀参加《广西壮族文学》的编写工作。他带领广西师范大学学生深入壮族山区进行艰苦的采风工作。

1960年8月，父亲到北京出席了全国第三次文代会，受到更大的鼓舞和

鞭策。从北京回来后，他即兴致勃勃地到东兰、隆林、龙胜、河池等县采风，采集了大量的创作素材。

1961年底，父亲出任柳州市桂剧团顾问，全家迁出大苗山，定居柳州。

从1962年至1965年，父亲除了为剧团编写剧本外，还收集整理和创作了大量的民间故事、儿童故事、小说、散文。这期间，他当选为中国作协广西分会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被吸收为电影家协会广西分会会员。他历任广西政协一、二、三届委员。

几年后，他从大苗山获得的创作素材已感到不够用了，正准备二进大苗山，再访大瑶山，搜集新素材。遗憾的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幸的遭遇接踵而来。

1966年到1977年，父亲被关、被斗，下放到干校劳动，受到了残酷的迫害，连写作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劳动过累，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可他不但坚强地活下来，还偷偷地进行写作、换名投稿。十年的动乱，他创作的热情都没有半点冷却。

粉碎了“四人帮”，形势大好。父亲又获得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他激动得赋诗于创作室墙壁上：“桑榆晚景好珍惜，白发更应争朝夕，老骥长嘶迎彩虹，敢将七五变五七。”此时，他已75岁高龄，仍夜以继日地伏案疾书，发表了散文《橘子洲头》《火红的彩霞》。1979年，他光荣出席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

1980年，他出版了有较大影响的《台湾民间传说》、童话《草鞋妈妈》，不久，此书被评为湖北省1980年儿童文学优秀作品。1981年春，他到湖北出版社去领奖，数日之后，刮去胡子，系上鲜艳的红领巾，满面春风带着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归来了。父亲显得年轻多了。

1981年，父亲以极大热情走完了他漫长的创作道路、度过他创作生涯的最后一年。这一年，他身体虚弱多了，可他仍以极大毅力写出并出版了电影剧本《灯花》《龙牙星》（已拍摄），出版了民间故事集《孔雀的翅膀》（四川出版社）和十本连环画（合作），发表了台湾小说《山魈》。

日本妇女北岛岁枝读了《灯花》受到教育而放弃了轻生念头，她非常感激

作者。1981年远渡重洋，千里迢迢来到柳州看望父亲。一篇《灯花》居然救了日本母子三人，父亲怎能不激动呢！他抱病陪日本友人漫游柳州、桂林的山水风光，刚送走日本《灯花》访华团，正要提笔撰写《论民间故事的功能》一文时，癌症的病魔就把他拖入了医院。

父亲明知得了不治之症，可他不悲观，他躺在病床上一面向癌症抗争，一面讲述他的散文、故事，叫我好好记录整理。

1982年元月31日，癌症终于夺去了父亲的生命。我从数十封唁电中记下了其中大苗山一位苗族老人的挽联：

音容永留苗寨，

“灯花”长照人间。

父亲去逝了，他以实际行动去实现了他的誓言：“七十年来文学迷，一生心血化为书”。

父亲谢康的治学与著作

谢庆云

卅年久别一相聚，限期离台促归程。

但愿和风吹淇露，春风珍重护航行。

这首诗，是今年我与妹妹桂云赴台探亲返航时，父亲赠给我们的。回想在台北与父亲相处的日子里，能观其言行，亲聆教诲，使我们得到许多立身处世的宝贵经验。父亲已是九旬老人了，仍精神矍铄，每日坚持读书、著书立说，刻苦治学精神不逊于年轻时期。尽管患病初愈，身体虚弱，仍是思维敏捷，做事讲求效率。他极珍惜时间，把能挤出的每一分钟都用在读书写作上。视写作为第二生命。他对我们说：“时间不多了，要赶快做才行。”他的著作甚多，已出版的书40种共1000万字（内有法文两种，翻译的3种），可谓著作等身。从分量言，在广西学人中，可入先进行列。在他的著作中，以社会学及文学两类为多。

父亲对我们娓娓讲述了他人生历程中的种种轶事、求学经历和教学生涯。他的一生，是勤奋治学、刻苦笔耕、致力于教育、力求服务于大多数人的一生。这里着重简述他的治学和写作生涯。

父亲谢康，别号永年，广西柳城人。1899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生。先辈多科第中人，先祖谢三聘，号莘农，同治甲子年中举，终生从事教育，历任岑溪县学训导，柳城凤山、龙城书院、柳江书院山长。祖父谢滋谷，清秀才，廪生，两任柳城劝学所总董，任1940年印行的《柳城县志》总编纂，是一位清正严谨的学者。父亲对我们说：“我小时能饱读诗书，多是祖父的遗泽和父亲的影响。”

父亲一生治学严谨，从小勤读好学，追求上进。他是柳州高中最早时期学生。几年的中学生活是在柳侯公园旁度过的。他说：“那里有罗池遗庙、荔子残碑、亭台楼阁。课余流连，每景仰先贤，曾立志为古文家。”中学时代，父亲最喜欢的功课是国文、历史两科，那时普通古文笔调的散文，甚至短篇的

骈文诗词，已能挥写成篇。

父亲中学肄业后，被聘任柳城县立模范高等小学校教员，后任该校校长。3年后，辞去校长职务，于民国9年初春，到上海大同大学预科就读。从乡下到上海，大开了眼界，接触了现代文明和新思想，发觉“世界之大，进步之快，决非我们乡下人的头脑所能想像”。仅半年时间，就结识了不少当时学术界的名人，其中有广西老乡钟震吾、马志超先生和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先生。父亲在回忆中说：“他们待人接物，恳切周到，彬彬有礼，使我这个南方‘蛮子’自愧弗如。”这时期，正值杜威博士来华任教，父亲听了杜威夫妇的演讲，受到许多启示。当时正是“五四”新潮澎湃之际，受了新思想的影响，父亲的思想观念有了较大的转变，从租界的繁华与上海县城的落后、贫穷相比之中，发觉了东方文明的停滞落后，痛感到“非急起直追不可”。后来因在上海读书花费甚巨，于是南下广州，考入广东高师文史部。高师当时是华南国立最高学府，所收多为清寒子弟、勤奋好学的学生。该校环境优雅，极利于读书学习，学校馆藏图书甚丰。有黄仲樵、杨果庵等一批名教授执教。父亲如鱼得水，他说，在学校住满4年，还觉得时间太短。

在上海与广州两地求学，是父亲青年时期思想转变的重要关键，高师4年，奠定了他往后几十年立身处世的师范生型和笔耕生涯的基础。在学问上，有八个方面的进展：（一）提高了对文学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兴趣。（二）除学中文外，还精通一二门外语。（三）注意中国文学史上的研究，先后发表了《离骚楚国方言考》《九百年前的地质学家沈括》《唐诗的音乐价值》《柳宗元评传》等20多篇专著，这是他最早的一批专著，可惜在迁徙中散失了。（四）对研究地质学和世界地理发生了兴趣。（五）1924年，亲聆孙中山先生在高师礼堂演讲三民主义，受益匪浅。（六）对出版刊物有了兴趣，这时他主编的刊物颇多，单是知用学社就有三种。有广西留穗学会编的《群言杂志》、广高桂同乡会编的《西江湖》等。（七）对团体服务产生热忱，他当时参加的服务工作，有知用学社、广西留穗学会、广东高师学生贸易部、广州广西会馆董事会等。（八）跟吴稚晖先生学注音字母，并商谈留法勤工俭学，引起留法动机。

高师毕业后，曾任省立玉林九中教员和柳州省立四中校长。1927年1月，向广西省政府及教育厅呈请辞去四中校长职务。1928年，以广西省政府《新广

西旬报》社特派员身份，经香港赴法国留学。由香港到马赛港，通过南中国海、印度洋、红海、地中海。他留心考察，把途中见闻写成《赴欧纪程》，在《广西旬报》上发表。

在法留学 12 年，是父亲人生中又一个重要的转折。初到巴黎，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陌生而新奇的西方文明世界，巴黎圣母院的壮观、凯旋门的雄伟，都使他流连忘返。在某教主的介绍下，迁入皇后镇天主教学生宿舍寄宿，历时 4 年。他参加了多次宗教仪式，对天主教逐渐有所同情和崇敬。通过自己的见闻，加深了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了解。他多次参观巴黎的国际殖民展览会和反殖民博览会后，写成《白种人的殖民世界》一书，约 8 万字。产生了对殖民地的研究兴趣。此时，他的爱国观念和民族意识得到增强，创作的内容更加丰富。“九·一八”事变发生，在巴黎的侨胞和留学生十分震惊和悲愤，纷纷组织抗日队伍，父亲当选为抗日会委员，并奉派伦敦，与留英华侨抗日会联络。

这期间，他参加了国联工作，六次到了日内瓦，与国际友人以及外交界人士往来，他负责驻欧国际宣传委员会工作，组织罗马及柏林观光团进行国民外交，主持巴黎书报社，参加国际反侵略大会、世界青年大会等国际性活动，进一步注意国际时事问题。他认为，我国对国联外交，应该加强；对驻欧各国使馆，应予以改善，要作调整及增加经费。对这些问题，父亲曾发表过几篇文章。后来他奉派负责驻帝文领馆的工作，敢于从事，劳怨不辞。

留法期间，法国人的批评精神、怀疑精神给了父亲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文学批评和历史方法。他在 1931 年 2 月号的《小说月报》发表《法国文坛对美国的批判》一文，就是这种精神的表现。这期间，他对社会学、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方面产生了兴趣，并到巴黎的民族学博物馆实习了一个时期。1931 年，东方杂志发表了他的《五十年来法国社会学鸟瞰》，中央日报发表了他的《欧洲文明与美国文化》，1938 年他编译的《东方各国禁贩妇女问题》，由国联出版。在进行学术研究过程中，他对法国文学产生了嗜好，用力较多的是法国文学，曾用法文发表一部有关母性与妇女文艺的著作，得到教授们的好评。还翻译了法国 3 部名家作品，也曾将一些中文书籍译成法文。

留欧期间，父亲曾入巴黎大学及法兰西学院深造，毕业于巴黎人类学院。1937 年春考取巴黎大学文科博士。

父亲从1928至1933年在法留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由海路自法国经越南转回广西。在归程中，为所见全民团结抗战情景感动，创作长诗《我重新发现祖国》。留欧12载，是他求学经历中最辉煌的一个时期。这时期，无论是思想的发展，还是学术上的研究成果，其领域之宽，内涵之丰富，远非高师时代所能比拟。

父亲的著作，较有代表性的有：

文学方面

- (一)《中国妇女文艺的母爱》(法文本、巴黎版)
- (二)《文艺论集》(香港版)
- (三)《文史论丛》(香港版)
- (四)《散文小品》(香港版)
- (五)《诗联清话》(台北版上、下二册)

社会方面

- (一)《中西文明及文化论丛》(台北版)
 - (二)《社会学及社会问题》(香港版)
 - (三)《社会学研究》(台北版)
 - (四)《社会问题论丛》(台北版)
 - (五)《卖淫制度与台湾娼妓问题》(台北版)
 - (六)《中国社会制度研究》(台北版)
 - (七)《中外社会思想之比较研究》(台北版)
 - (八)《中国社会思想简史》(台北版)
 - (九)《孙中山思想研究》(台北版)
- 其他：《教育学要义》(香港版)

198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台湾怀乡思亲诗词选》载有父亲七律绝句一首：

立春后五日偶成

兵戈扰攘走仓惶，卅载流人几断肠。
柳水鹅山无恙否，逢迎却忆故家乡。

壮族诗人黄勇刹

鹿绍元

黄勇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壮族诗人。他多才多艺，既是热情奔放的壮族歌手、诗人，又是卓有成就的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专家，文艺理论家，也创作不少小说和散文作品，他把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灿烂的壮族民族文化事业。

黄勇刹 1929 年 12 月 26 日出生在广西田阳县那圩村的一个壮族贫农家庭。父亲 1929 年参加过韦拔群领导的农民赤卫队，母亲黄妹亭是当地有名的民歌手。那圩村素有歌圩习俗，兴唱壮语民歌。他自幼随母年年参加歌圩，从民歌手的抄本和口唱中学到很多好歌，从学歌、唱歌到编歌，年岁还不大，就成为村里年轻唱歌人中的佼佼者。

黄勇刹原名黄玉琛，少年时代在家放牛，常在隆冬季节随家人到深山野岭去烧木炭。稍长后就读于田州镇小学，抗战后期，他考取了在今田林县的田西师范简师班，后又考入南武师范。按当时的规定，简师班毕业学生要升学，必须有 3 年的教龄才准予录取。由于他家境清贫，没有人事关系，所以小学老师当不成，当然也就不能录取了。后又想投考百色高中，但因没有中学毕业证书无法报考。这时恰逢一族人叫黄勇利的刚从中学毕业，黄勇刹便向他借了中学毕业证书，在“利”上加上“丿”，便成了“刹”字，于是便得现名。

中学时代的黄勇刹，酷爱文艺书籍，特别对诗歌，更是手不释卷。他在高中阶段就开始文艺创作，向报社投稿。其中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笔名曾用“泪眼”“南风”“新浪”“观海”等。这些作品思想倾向进步，为反动政府所注意，于是迫使他极力寻找革命出路。

1949 年 12 月，黄勇刹参加了革命工作，195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做过民运队员、小学教师，后考入广西省人民政府司法训练班，结业后分配到广西高级法院、柳州市检察院、柳州铁路检察院工作。

1958 年，他调到柳州市文联工作，任秘书长职务，从此走上文艺专业的道

路。1959年3月，市文化馆曾昭文创作的彩调剧《刘三姐》，由柳州市彩调团排演，参加柳州地市联合举办的柳州专区专业文艺会演，引起了文艺界人士的关注。4月，该团又以《刘三姐》参加广西文化局举办的“庆祝国庆十周年献礼演出”活动，受到中央文化艺术部门的贺敬之、张庚等专家的赞赏。为了提高《刘三姐》的创作演出水平，黄勇刹以熟悉壮欢（壮山歌）的特长，参加了《刘三姐》第二方案的提纲研究，后又参加了由柳州市委组织的有邓凡平、牛秀、曾昭文、龚邦榕等参加的《刘三姐》创作小组，先后深入宜山、罗城等地去采风，收集山歌，向各地民歌手请教，从而使他对丰富多彩的各族民歌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1959年7月，《刘三姐》（第三方案）写成，一方面交由剧团排练，一方面由牛秀、黄勇刹、吴超凡携带剧本赴北京征求专家意见。7月22日，《剧本》月刊在中国文联召开《刘三姐》（第三方案）剧本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贺敬之（会议主持人）、孙福田（中国剧协副秘书长）、严青（《剧本》编辑部主任）及凤子、范溶、乔羽、田川、任萍等11人。通过这些创作和学习，黄勇刹获得更大的教益。

1962年初，黄勇刹从市桂剧团到市彩调团任副团长，主管剧团业务工作。这时期剧团很困难，他积极送戏下乡，带队到武宣、石龙等地演出。在工作中和大家一块干，和演员们一块滚地铺，把剧团带得生气勃勃。在百忙中还积极组织 and 参加文艺创作，与邓凡平、曾昭文创作了以民间谚语为基础的彩调剧《指天椒》。市彩调团演出后，剧本在《柳州日报》刊载，受到好评。

1962年下半年，黄勇刹调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任理论研究会组长，1979年任秘书长，此间从事民间叙事长诗《嘹歌》的搜集、翻译整理和民歌理论研究工作，并进行诗歌、民歌、歌剧、戏曲创作。1980年被选为广西作家协会第二届常务理事，同年8月27日广西民族文学工作委员会成立，黄勇刹被选为副主席。他曾出席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先后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第三、第四届理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会理事长，中国歌谣学会副会长。

黄勇刹是一位诗歌民歌兼长的诗人，他常即兴放声歌唱。1979年，在全国少数民族民间歌手、民间诗人座谈会上，即兴创作并吟唱了一首民歌，赢得与会者赞叹和热烈的掌声。他唱道：

什么比茶香透瓶？什么比花香透心？
谁人集会香山会？什么比酒还醉人？
好花比茶香透瓶，好酒比花香透心；
各族歌手香山会，好歌比酒还醉人。
不同语言同心声，不同年龄同豪情；
唱党唱民唱四化，团结歌声漫北京。
不同琴弦同心弦，不同风格同调门；
高唱民族大团结，越弹琴弦越知音。
各族歌手会香山，知音琴弦日夜弹，
弹到“四害”害人惨，牙齿咬断铁栏杆。
几多乐器被砸碎，几多歌本变火灰，
几多歌手被迫害，惨死不见白骨回。
平反冤案是党恩，歌手放声招迷魂；
哪个听了心不碎，十根肝肠断九根。
各族歌手聚一堂，开口就唱党恩长；
今日歌手香山会，全靠英明党中央。
海宽装得千江水，地大装得万重山；
党恩比海比地大，歌手不唱心不安。
歌台搭在香山上，题材多样不寻常；
唱罢歌颂和暴露，还唱情妹和情郎。
天上断云海断沙，人间不断爱情花；
不信就请问自己，何曾到老不成家。
爱的多来恨的多，心中的歌千万箩；
若问歌手为何唱，因为生活不断歌。
北京香山摆歌台，歌声唱得心花开；
我象蜜蜂穿云雾，一路唱歌一路来！
南宁来到北京城，各路歌手唱不停；
人民万岁歌万岁，谁想禁歌万不能。

天旱不断红河水， 雨打不烂石山坡；
生活万岁歌万岁， 人民代代不断歌。

他的即兴创作和歌唱，唱出了人民对“四害”的愤恨，唱出了党的伟大，唱出了人民的心声，唱出了歌手为党为“四化”而纵情歌唱的豪情。

黄勇刹的文学活动非常广泛，除搜集、翻译整理大量民间文学外，他还创作小说、散文、诗歌，撰写理论文章，共约300万字之多，其中200万字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才问世的。1963年他与黄耀光合作整理发表了民间故事长诗《唱离乱》；1980年他创作的诗歌《因为歌》，获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1981年举办的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1981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发表他的文艺理论《歌海漫记》；1983年他的理论专著《壮族歌谣概论》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在1985年获中国作协广西分会、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联合举办的广西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1981—1984）作品奖。另外，他的代表作品还有叙事民歌《马骨胡之歌》（合作）、《歌王传》（合作）、《莫一大王》（合作）、电影大型记录片《壮乡处处是春天》（合作）、论文《采风脚印》、诗歌《中国有个太阳城》等。

黄勇刹在小说、散文、诗歌、文艺理论、戏剧创作方面的成就，是与他数十年来的勤奋耕耘分不开的，刻苦是他自幼即形成的进取精神。早在中学时代，他对古文、世界著名作品，特别是诗歌，能一大段一大段背诵下来，在《刘三姐》的创作中，他收集到的民歌，也废寝忘食地一首一首死记硬背出来。在他从事专业创作的20多年中，长期坚持跋山涉水、穿区过县去采风，他的足迹踏遍了广西少数民族乡乡寨寨，他每走一段路程，就有一串民歌的收获，每有一串民歌的收获，就有一群歌手的结识。不断深入生活，向生活学习，做人民群众的学生，这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1984年12月27日，黄勇刹在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代表大会期间，不幸逝世于北京。他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人们永远怀念他。

壮族剧作家韦壮凡和他的戏剧创作

鹿绍元

韦壮凡是位区内外颇负盛誉的壮族剧作家。他是广西鹿寨县人，生于1939年12月。中国共产党党员。1982年担任柳州市文化局副局长，1986年任局长；1984年加入中国戏剧家协会；1986年加入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同年，任柳州市戏剧、曲艺协会主席，广西壮族自治区文联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广西分会副主席；1987年任柳州市文联主席；1989年调广西艺术学院任副院长。

韦壮凡于1958年秋从柳州二一高中毕业后，进柳州机电厂当工人。工作之余，积极参与业余文化艺术活动，编剧本、演彩调，是个活跃的业余文艺骨干。1962年2月，到自治区工人文艺训练班学习。同年，参与广西职工业余文艺代表团赴北京参加全国职工业余文艺会演。7月，任柳州市艺术训练班业务教员。8月，调市文化馆任文艺组长兼《文艺演唱》编辑。从此，跨入文化艺术专业之门。1963年，《文艺演唱》发表了他的处女作《将军与农民》，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后又改为文场《选郎君》，演出后获演唱作品二等奖，随即在市外刊物转载，电台也录音转播。1963年，他到区文艺干校戏剧编导训练班学习，主修戏曲编导理论。这期间，他创作了彩调现代小喜剧《田老满卖瓜》，参加训练班结业汇报演出，1964年该剧由柳州市彩调剧团排练，参加广西同年5月举行的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演出，受到好评。剧本发表在《广西文艺》1963年12月号。1964年8月，韦壮凡调柳州市文化局创编室任编剧。同年，他创编的桂剧现代小喜剧《夫妻行》，由柳州市桂剧团演出，并参加全区现代戏文艺会演。广西人民出版社辑入《革命现代戏丛书》出版。1965年12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72年他创编的彩调剧《长缨在手》，由柳州市文艺工作团一队（戏剧队）演出。1975年，创作《钟声阵阵》，由市桂剧团演出，参加同年12月举行的全区现代戏调演。1976年，柳州市代表队排演了他创作的现代桂剧《风云岭》，参加全区调演。1977年，他创作现代桂剧小戏《百年大

计》，由柳州市文艺代表团演出，参加全区现代戏会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韦壮凡创作热情越发高涨。1978年，他创编《未结束的审判》（文场话剧），得到文艺界的肯定，后来桂林、新疆等外地剧团相继上演，受到欢迎。1979年，广西农村一些地方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社会上产生了不同的反应，褒贬不一。他深入农村去体验生活，在象州中平、大乐及金秀瑶寨一些实行承包责任制的地方，看到了瑶族人民从“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大刀下解脱出来后，凭借山区优势，种植香草、香菇、八角等作物，发展多种经营，向致富的道路迈开了第一步。农民新激发出来的热情和干劲，触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写出了表达农民心声、讴歌承包责任制这一新生事物的八场彩调剧《喜事》，由柳州市彩调剧团排演，几经修改，1981年10月参加柳州市专业文艺调演。同年11月，赴南宁参加全区现代戏观摩演出，获演出二等奖、剧本创作二等奖。1982年4月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播放。6月，全国举办（1980—1981年）首届剧本评奖，荣获文化部授予优秀剧本奖。剧本先后在1982年广西《剧目与评论》（第一期）、《广西1981年全区现代戏观摩演出剧目选编》《柳州文艺》发表。1984年获全国少数民族题材戏剧荣誉奖，1989年12月获广西区政府首届“振兴广西文艺创作”荣誉奖。

韦壮凡同志从1982年就任柳州市文化局副局长、局长以来，为提高柳州市创作演出队伍的水平，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中，还挤出时间创作。1984年，他看了历史传说故事“泥马渡康王”有新的启发，组织了《泥马泪》剧本创作。他团结剧组人员，发挥集体智慧，使剧本的主题从骂皇帝的残酷，提升到鞭挞毒害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造神意识的高度。在思想和艺术上有新的突破，夺得1986年“广西第二届剧展”桂冠。1987年4月，桂剧《泥马泪》受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邀请，赴北京为“国际戏曲学术讨论会”演出。引起首都文艺界和国内外专家的关注。著名戏剧家曹禺为《泥马泪》的演出题词：“戏剧在不断探索中前进”，热烈祝贺演出成功。著名戏剧家曲六乙称誉该剧是桂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1988年获自治区人民政府首届“振兴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韦壮凡作为《泥马泪》剧组的组织者和作者之一，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韦壮凡在任领导职务期间，除了亲自动笔创作外，还热情地帮助辅导作者提高创作水平。如在1987年的柳州市首届戏剧小品电视大奖赛中，柳江县壮族作者陆焕高创作的参赛小品《上上下下》，开始演出效果甚差，在初赛中就被淘汰了。韦壮凡觉得，这个本子有一个好的点子，就是剧中那个农民，在3个干部的办公室前转来转去，但由于3个干部的推诿扯皮，结果什么事也办不成，从中可以透视到目前一些机关存在的机构重叠、不干实事的弊病。他找作者谈想法、出点子，鼓励作者改成话剧小品。作者在他的鼓励支持下，经过二次修改，终于写成话剧小品《肿瘤》。之后，韦壮凡又请来导演和其它剧作者再次为这一小品讨论修改。又通过排练提高，结果效果很好，最后获选参加1987年全区首届戏剧小品电视大奖赛，夺得了业余组第一名。还有小品《莫明》《高女人和矮男人》也获得了大奖赛二、三等创作奖（业余组），《农伯与女郎》获得了专业组一等奖。这些成果的取得，无不渗透了韦壮凡的心血和汗水。

韦壮凡为了在柳州组织一支高水平的创作队伍，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他团结老一辈剧作家，如曾昭文、龚邦榕、郭玉景等，尊重他们，调动和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对中青年作者，他积极鼓励、帮助和培养，使他们在艺术实践中不断趋于成熟，如王超常、符震海、吴源信、李维邦等。在市委、市政府的关怀、支持下，这批文艺创作的中坚与广大文艺工作者共同努力，开创了柳州市戏剧工作的新局面，在广西第一届、第二届剧展和广西首届戏剧小品电视大奖赛中，连中三元，《玉蜻蜓》《泥马泪》相继进京演出，引起文艺界的瞩目。

剧作家韦壮凡多才多艺，多年来，不仅创作了一批有影响的剧目，还创作了一批曲艺、小说、诗歌等文艺作品。其中《友谊诗抄》《帽子》《姑娘的心愿》《晨光新曲》《你、我、他》等，分别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和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和在文艺会演中获奖。

韦壮凡的作品贴近时代，反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沸腾生活，反映时代精神，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去观察生活、熟悉生活，从生活中发现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闪光的思想和行为，从而提炼升华主题。这是他在创作上取得成功的重要方面。从《将军与农民》到《田老满卖瓜》《夫妻行》《百年大计》《未有结束的审判》《喜事》，逐步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作品以喜剧见长，

笔调辛辣，语言风趣，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这些作品具有鼓舞人民奋发向上和积极进取的作用，突出了时代的主旋律。勤奋刻苦是韦壮凡成功的重要基础。

“勤学方知不足，知不足而刻苦”是他一生奋斗的座右铭。他在担任柳州市文化局局长之后，仍参加吉林大学中文系理论专修班学习，经考核合格，取得结业证书。为了提高创作的艺术技巧，他不仅努力学习文化和文艺理论知识，而且还虚心学习各个剧种的表演艺术，为他的创作增强了艺术感染力，极大地发挥寓教于乐的作用。

琐忆地方书画家李漫涛

朱光华

地方书画家李漫涛，年过古稀后，作古 10 年了。李老世居柳州，解放前家居七家村，后改文武街。他和书画家陶尊五、邓俊群、敖起絮、曹墨侣、陈汉宸、韦炳勋、罗沛林、黄河剑、何如坚、陈墨交往深厚，经常相聚互访观摩品评，切磋画艺书论。书画后辈陈惠琪、汤漾、吴健邦、朱光华、叶观望、阳永祜等在书画技艺方面都曾受过漫涛老师的精心指导，深得教益。李老平易近人，性格开朗，着中山装，穿着简朴。他和同辈道友或青年后辈都谈得来，出语幽默，谈笑风生，十分融洽。他对前人书画的真贋鉴别也颇具眼力。市博物馆成立后收购古书画，也常邀李老去过目，可知他浏览甚广，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知识。

李老书画兼优，隶书行楷，山水花鸟都有所长，特别爱画荷花。笔者曾问过他，为何甚喜画荷？他说：“宋人周敦颐对荷有文字赞美，我也有丹青之好，皆因此花出污泥而不染，品行清雅，仪态高洁。”他还善画山水，取承古人传统笔墨外，更注重汲收近代泼墨挥洒的新意，所作山水融会古今之法，功力见深，别具一格。他的书法家“二王”十七帖，行书古朴，隶书稳健。1983 年柳侯祠重修后，祠内屏风简介，即请李老捉笔。所书隶体，端庄隽永，字形多变，为参观者啧啧称赞。

李老双耳失聪，其不少书画作品，不其实名，常落“聋叟”二字。作画写书，态度十分严谨，凡自己不能过目之作，决不轻易送人。一次，他应来者画松鹰，画了三张，都不满意，观者拿了其中一张说：“这幅还可以。”请李老赠送。李老说：“败笔不少，鹰眼欠威，墨韵不足。”说罢将画揉碎，投入纸篓，并说：“我宁愿欠画债后还。”他常说：“书画此道，即使名家高手，亦常出笔即废，以废品应酬，有欠尊重。”他对同道和爱好者求画，往往有求必应，不加拒绝。

60 年代初，我在李老家闲聊，有两位与李老素不相识的青年慕名造访，还

带来 10 多张国画作品请求指导。李老欣然相待，还泡上热茶，然后他将每幅作品仔细过目后，先竖起拇指，称赞画面好的细部。再十分谦和地指出笔墨、章法、设色欠妥的地方。并提出修改意见及鼓励之词，谆谆善导之情，使两青年高兴而归。平日也常有求画者至，李老兴致来时，往往立即摆开文房四宝，当场挥毫。此时亦偶得高妙之幅，他从不自留，都割爱相赠，因此他逝世后，自作书画留藏甚少。

50 年代及 60 年代初，李老在印刷厂从事美术设计，多次参加区市书画展览及在报刊发表作品。记得 1963 年在柳侯祠举办画展。最近作古的画家邓俊群，毕生喜画梅、兰、竹，展出多幅作品，李老参展山水墨荷外，特意画了一幅“棉花图”，并题诗云：“人画我也画，人笑我不怕，不画梅兰竹，只爱画棉花。”此幅刚好与邓老梅竹相邻，有意和邓老开了一个风趣玩笑，引得在场诸君开怀大笑。

李老书画的深厚功夫，全自然造化及写实钻研。抗日战争时期，全国知名文化人士会集桂林，李老亦参加对敌美术宣传工作。与徐悲鸣、阳太阳、马万里、张家瑤、龙廷霸……都交往甚切。“文化大革命”十年，花鸟山水画一时销声匿迹，李老也沉默挂笔，常与几位书画知友品茗闲话。正值 1977 年书画再度解冻不久，他却与世长辞，令地方书画同道十分惋惜，感念不已。

艰苦创业 执着追求

——记制药业老行尊黄斗才先生

刘郁卿

黄斗才(1914—1952)原籍广东顺德县马齐乡,出生于柳州市。其父当时是柳州大同春药房司理。他六岁破蒙,12岁就读于关铁算开设的国粹私塾(地址在今龙城路二巷)。就读者大部分是市内工商界子弟。其后关铁算应聘在柳州总商会内设馆,仍从其事业,直到1933年才到大同春药房工作。

黄斗才天资聪颖好学,在国粹私塾的诸多就读者中,他是其中的佼佼者。

大同春是当时柳州市唯一经营中西成药的药房。随着父亲的经营浸润,又由于广州市大同春药房与柳州大同春有联系,有些成药在柳州分装,引起黄斗才从小就对药品的研制、加工、生产、经营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1932年后,广西政局比较稳定,市场渐趋繁荣。群众感到中西成药效应快,乐意采用。1934年黄斗才接任大同春药房经理。他锐意经营,积极推销,业务逐渐发展,到1935—1936年间,他在粤籍工商界中,已崭露头角,赢得了声誉。遂想自己生产成药,向制药业方向发展。

只读了十二年私塾的黄斗才,深感自己药学知识的不足,因此,1933至1934年间,他又读了一年多卫生专业夜校,钻研中西药的药性药理,配方加工等专业知识,虚心向行家医生等专业人士请教,逐渐充实自己。

1936年他开始用进口的西药原料,以黄家和名义试制治疗常见疾病的胃金丹、气痛散、止咳散、红膏药等药物。为了打开销路,曾斥资大造广告,并烧制一批广告茶具,馈赠客户。1937年夏,他被选为柳江县(现柳州市)商会理事长,是柳江县商会改制后的第一任。3个月后,抗日战争爆发,商会事务增多,既要料理店务,又要处理会务,已无暇顾及药品生产(旧商会理事长、常务均义务职、不脱产)。

1942年黄斗才以黄宝善制药厂名义,出产退热散、止痛散、止咳散、消积散四种成药。用“黄宝善”和他自己肖像作注册商标,包装改用凹凸版字在广

州彩印，装潢美观。为扩大市场，由大同春药房总经销，还独资在广州市18甫北路开了间宝华药房经销。

斗才推销商品，很有办法，他派出专人，深入柳州专区各县镇和贵州云南等地，张贴广告，宣传药品的用途功效，收得相当效果，业务蒸蒸日上。正当业务发展之际，日寇南侵，柳州沦陷，业务又告停止。

1945年柳州光复，黄斗才重振旗鼓，迅速恢复大同春药房，交其堂弟经营，自己则着手把黄宝善药厂迁到广州市怀远驿，继续生产，以图发展。从此，他专心致志，精细擘划，潜心经营管理，几年间，黄宝善药厂在广州市制药行家如林中，也站稳了脚跟。特别是广州市解放后两年间，在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政策鼓舞下，他打破顾虑，积极经营，由初到广州时只有20多人生产的小厂，发展到1952年有80多人的中型厂。他眼光长远，考虑到成药日后的剂型改革，生产要发展，原有厂房不敷应用，遂进口了制药机械设备，由手工操作，过渡到机器生产。黄宝善的产品也行销到全国各省市。1952年黄宝善药厂的销售额，在广州市制药业中，跻身前列，声誉鹊起，他也在这一年中，不幸逝世。

黄斗才在柳州生活、求学、经商创业近32年，最后成为制药业行家，总结他的成功经验，大致有如下几方面：

一、薄利多销。他在经营管理方面，精打细算，杜绝浪费，以减少成本，把产品的毛利率，尽量降低，以争取顾客。

二、重视广告宣传，在柳州和初到广州的几年，为了开拓市场，每年产品的利润，除用于扩大生产外，其余大部分投入广告费。在全国大多省、市、县和部分乡村，都张贴或涂写有黄宝善药厂出品的退热散、气痛散广告。

三、派出推销员组成小分队，随带产品，深入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广西等地城乡，联系客户，了解市场，宣传推销产品。

四、面向广大农村，用邮局代收货款的办法，打开销路。旧社会偏远山区，缺医少药，而当地小药房，人力少、资金少、周转困难。邮局代收货款的办法，解决小药房困难，使其成为黄宝善四种成药的代销店，产品销量大增。

五、讲究质量、讲究信用。宁愿药厂经济受损，也要维护药厂的信誉。例

如：在客户来信述及寄去的药品收不到，或收到的药品有受潮或损耗等情况时，不论损失原因属谁，都立即如数补偿给客户。

黄斗才精明干练，经营专一，认定一个目标，必全力以赴，务期成功，他对人诚恳，热情大方，热心公益，因此，也获得各方人士的赞赏，这可能也是他成功之道吧！

革命事略 刘古香革命事略 刘古香革命事略 刘古香

委 市地方志编 市政协文史委 市地方志办 市政协文史委 市地方志办 市政协文史

是侯长海撰次) 家住石前昌魁会长撰次) 家住石前昌魁会长撰次) 家住石前昌魁

国社联中编次) 刘古香撰次) 刘古香撰次) 刘古香撰次) 刘古香撰次) 刘古香撰次)

立民国。 融券，建立民国。 融券，建立民国。 融券，建立民国。 融券，建立民国。

铁成、卢笙白、黄岱等，拟先取柳州，继攻桂林，并已取得担任桂林新军的冷御秋等同意。乃集结民军千余人于柳城太平圩和四十八鼻一带，伺机暴发，詎被右江镇总兵李国洽发觉，即率大队围攻，激战四昼夜，撤退苗山，陈晓峰愤而自杀，刘古香与部分同志星夜步行至石龙搭轮船走广东，刘古香离柳时，将工作交王植槐主持，特别以刘震寰负责组织民军，震寰以其家财作经费用，向来宾、迁江、忻城、雒容、象县各地绿林运动，积蓄革命力量。同时开展对清军各级军官的策反工作。刘古香夫人马电，勇敢有谋，负责筹集军需，并能联络四方会党，运动绿林，又从清军官家属运动他们反正。

1911年初，香港成立革命统筹部，联络云南各省，指示各地同盟会负责人积极准备策应广州起义，黄兴派刘古香负责选拔广西志士20人为先锋，准备攻广州督府。刘古香即与柯汉资、钱权在广州旧仓巷芙蓉里四号，暗设联络机关，开展活动。指派李德山回广西邀来韦统铃等20余人，4月19日（农历三月二十九）广州起义，刘古香率领李德山、钱权、王植槐、郭干臣、韦统铃等广西同志共约30人，随黄兴从小东营进攻总督府（衙门），尽歼其门卫。清援兵大至，起义军弹尽无援，李德山等广西志士7人壮烈牺牲。刘古香和部分同志分别向大南门、大东门冲出，乘小艇过河南，次早乘轮出港。

刘古香到港，在同盟会南方支部参加筹款和购买武器工作，他介绍从南洋回国的华侨殷商捐助10000多元。

武昌起义后，刘古香和姚雨平奉命先入广州布置新军反正。11月9日与胡汉民、姚雨平指挥新军光复广东，胡汉民任广东都督。刘古香任都督府秘书长。

1911年11月9日（农历九月十九日），柳州宣布独立。之前，同盟会员钱权、王冠三、宋洪（字新洲）、柯汉资、郭干臣、王干廷等数十人集议决定：一面指挥民军集结压境；一面通过亲友关系向清官兵策反。如宋新洲通过朱子垣之妻陈文说服防营分统陈朝政（号宗棠），蔡劲柏通过刘月卿说服防营帮统刘炳宇（号统丞）。当时右江镇台兼防营统领陈鸿初（号仲宾）实力已为陈分统、刘帮统等掌握，并向陈统领陈说利害关系。同时王冠三、宋新洲、郭干臣、王干廷等则手执武器进入各衙门威胁，右江道台沈炳炎、知府高墨霖、知县万荣龄只求脱身，皆愿听从独立。同盟会随即决定在柳郡中学堂（今中山东路文化大院）

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柳州独立。大会通过：成立“右江国民军总机关”，王植槐为总机关司令官，迅速建立起以同盟会员为主体的新政权机构；发出通电宣布独立；王植槐立即致电广州，请派刘古香回柳主持工作。当时广东革命政府为加强革命党人在广西力量，即派遣柳州革命派人士中最有威望者刘古香，乘两艘浅水兵轮于1911年11月13日回抵柳州，主持右江国民总机关军政事宜，并带来几十名华侨敢死队，全部配备炸弹和手枪，准备参加北伐。

1911年11月28日，右江国民军总机关改组，成立右江军政分府。刘古香任分府总长，并取得广西军政府确认。

当时，融县（今融水、融安）知事张礼干及其警备大队长焦盛贵，有反对独立形迹。刘古香察实，即派民军与该县士绅及各县团练联络，组织融县民军办事处。终于12月1日（农历十月十一日）柳州民军与融县民军合力平定了融县顽抗势力，随即宣布融县独立。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同此一天，刘古香在柳州就任广西右江军政分府总长。同时刷新军、民政务，派出朱奇元、邓宝书、邓士瞻、黄坤、王宏猷分任迁江、融县、怀远、罗城、马平等县知事，钟尧勋任柳州警察局长。

1912年3月，怀远与龙胜边境土匪复炽。刘古香率队前往处理。省防军亦由龙胜到达古宜会师。刘古香主持，剿抚兼施，吴吉彪及吴国泰就抚。然后以计擒李林红、张三嫂、梁月初，悉经刘统领一一正法。余匪王均臣、杨大林恃险顽抗，卒被次第平复。

此役，刘古香为巩固柳江革命根据地，主动采取措施，招抚绿林，壮大民军队伍，肃清匪患，知县邓士瞻（柳城人）协力善后，恢复地方秩序。

陆荣廷任广西都督以来，整编军队，将包括民军所有全省武装力量，置于自己控制之下。1912年2月26日，陆荣廷电令柳、梧、龙州军政分府，3月1日撤销，原分府总长改任统领。刘古香任第五统领（统兵1000余人）亦即广西境内仅存同盟会掌握的武装），百色设镇台，令调刘古香为百色总兵。刘置之不理，但他继续训练新军，加强治理右江各县行政，掌握革命实力。

当广西独立之初，同盟会中曾有人提请省参议会推选刘古香为都督之议，

终因实力不足与陆荣廷抗衡而作罢。柳州同盟会员有认为广西宣布独立时，陆荣廷态度暧昧，对邕、梧、浔、柳等地革命党人肆虐，曾提驱陆口号。由此种种，陆荣廷对柳州方面革命势力，十分忌疾。袁世凯帝制自为，陆荣廷拥袁据桂。孙中山发起讨袁的二次革命后，陆对柳州革命组织，进行分裂，收买柳州府长（即知府）王狮灵和刘古香从绿林中招安并经提拔到实力最强的沈鸿英。王狮灵与沈鸿英亦以陆荣廷附袁势大而变节投靠。柳州实已形成陆荣廷势力控制之下。

1913年7月初，孙中山、陈炯明分别由香港、广州来电，促令响应二次革命。7月12日，二次革命爆发，柳州革命党人毅然树起二次革命讨袁大旗。当刘古香同意广东起兵讨袁时，柳州革命派处境已日趋险恶。外是拥袁军阀陆荣廷据南宁，陈炳焜据桂林，两面夹攻；内有王狮灵、沈鸿英叛变投靠，但刘古香不畏艰险，仍继续作讨袁活动，取得讨袁军信任，予以饷械支援。一方面前往南宁运动独立的农实达被陆荣廷捕杀，另一方面派去湖南运动的陈绍虞，到达道州，接柳州失败迅而终止。刘古香不顾自身安危，不作逃避打算。当部下兵变之夕，马氏夫人及媳杨澄丧于乱枪中，刘古香越墙伤足，被沈鸿英软禁。陆荣廷接王狮灵密电，于10月9日专程抵柳，沈鸿英将刘古香当作战俘献给陆荣廷，陆急电袁世凯请示，袁复电将刘古香就地枪决。

临刑前，陆设宴款刘，席间示以袁电，并问刘：“你有何话说？”刘怒斥陆，说：“沈鸿英是我一手栽培起来的，今天为你帮凶而杀我，将来沈鸿英同样可以杀你！”然后即昂首阔步，走向刑场（东门外粤东会馆前鹧鸪堆，今机关幼儿园）从容就义，成为二次革命最后的牺牲者。

时公元1913年10月13日（农历九月十四日），刘古香年仅44岁。他革命的一生，功在民国，史迹卓著。二次革命讨袁牺牲，血洒柳江，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予以明令褒扬（原件现存市博物馆）。柳人缅怀深切，曾以兴仁路改名古香路（即今曙光东、中、西路。详《柳州市地名志》21、22页）以示纪念。

卢焘在柳州二三事

蒙智康

卢焘，字寿慈，壮族，广西宜北（今环江）县人。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农历五月初一，出生贫寒，勤学勇进。青年时即从事反清活动，是早期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前，1905年曾到柳州设立秘密联络站开展革命工作。并准备举行武装起义。曾与李德三（黄花岗七十烈士之一，罗城人）、刘古香（柳州人，同盟会柳州支部负责人）等革命志士遵照孙中山武装起义的指示，他从香港秘密运送枪支弹药回柳州。岂料在武宣事泄而被清政府通缉，遂远赴云南，考入陆军讲武学堂，继续进行反清革命活动，辛亥革命以后，卢焘投入如火如荼的反袁护国护法运动，并屡建功勋。他37岁时担任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后代理黔军总司令；40岁时奉孙中山大总统电令为贵州总司令兼省长。并追随孙中山元帅大本营。被聘任、委派为高等顾问和高级参谋。后因其母病逝，离穗返黔，治丧尽孝。自此，他奔波于黔、桂、粤诸省之间，致力于地方交通、文化等建设事业。

1936年“六一”运动时，为了促进蒋桂和谈，卢焘挺身而出，到广西南丹收编云南、四川等地在野散军并就任国民革命抗日救国第二十五路军总司令。曾先后三度奔赴南宁，从中斡旋调停，促进团结抗日。1949年11月，为了迎接贵阳和平解放，为了维持社会治安，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卢焘毅然挺身而出出任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主任委员。不料，竟于贵阳解放前夕（1949年11月14日晨），被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头子刘伯龙以开会为名，诱害于贵阳郊外。时年六十八岁。

卢焘牺牲后，中央民政部追认他为国家级革命烈士。卢焘一生光明磊落，清正廉洁，做了许多重大的益国利民之举，其爱国精神千古永垂。

卢焘烈士之生平活动，多有记载。兹根据卢焘烈士有关亲友覃栋梁等的回忆。对卢焘生前在柳州的活动，及其轶闻、轶事，作一些必要的补述。

1938年春，卢焘应李宗仁之邀，参加广西各界赴前线到江苏徐州、安徽等地慰问抗日将士，并参观震惊中外的台儿庄战役。返回时，取道柳州，转赴贵阳（因为他已在早一年举家离广州到贵阳定居）。到柳州后，一不惊动地方官绅，二不告知亲朋好友，而是径直投宿往昔住惯了的培新路亚新旅馆。该馆因位于当时的要津闹市，早已客满。该旅馆经营者卢秀女士，因与卢焘早年彼此都认识辛亥革命老人林耿凡（宜山县人）的缘故，曾结拜为义兄妹。卢的投宿，自然惊动了这位义妹，从而得到妥善的款待。

为了便于奔走抗日救国大计，卢焘自1940年起在柳居住在东门路64号“息尘寄庐”（即今罗池路昔阍维雍公馆第三家隔壁）。卢焘应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的聘请，担任国民党广西省政府高级顾问，做一些团结各界抗日的工作，诸如动员地方士绅及各阶层力量，以支持抗日战争，支持广西当局的政治改革。黄旭初利用左派势力，在南宁创办干部学校，组织学生军（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党地下武装“东江纵队”及解放战争中的“两广纵队”的骨干力量）。

那时，广西省政府每月拨给卢焘高级顾问薪金200元大洋。卢焘将此钱大部分用以接济一些贫困亲友，一小部分用来支持在广东碓石（南雄）就读于中山大学文学系的五女儿卢慈达（现定居于美国加州）。

在柳州就读的晚辈们，常常亲聆卢焘先生的教诲。卢焘常以其早年参加辛亥革命的历史，训导子孙，尤其强调“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道理。为了推动革命，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他曾于1908年，到香港秘运武器，并伪装其为“洋纱”，装载上船，取道珠江、经梧州溯水而上。卢焘亲自押运。抵达武宣码头时，被清政府的厘金局（相当于现在的工商、税务局）发现。故因事泄而潜回柳州。

卢焘在柳州的家眷有母亲莫太夫人，夫人覃清德女士，年方3岁的长女卢慈祥（即覃栋梁生母）、年仅1岁的次女卢慈明。她们都居住在府前街（今中山路老人委大院斜对面立新路口）。卢焘自武宣潜回柳州，走到富贵升客栈门口（今工贸大楼对面），得知清政府的密探正欲往家中抓他，情势万分危急，已来不及辞别老母、妻女，迅即遁出东门到沙角，乘便船逃往梧州。抵梧时得到同盟会地下组织的资助，转赴广州。是时阅见报登昆明讲武学堂招生，遂从

广州到广西龙州，入安南（今越南）海防，再沿滇越铁路乘火车到达昆明，经三次考试，均列榜首，遂考入当时满清最先进的军校云南讲武堂。在讲武堂与朱德是同学。朱在步兵科，卢在特别班。当时有10位地下同盟会员结为异姓兄弟，卢焘年长（比朱德大四岁），称为大哥，朱德为四弟，其间还有李云鹤、金汉鼎等等。后来，均在辛亥革命及护国护法运动中建立功勋。

卢焘1940年居住柳州，至1944年7月底日寇南侵离柳返筑为止，约四年时间。此期间来访者有冯玉祥、蔡廷锴、茅以升、李济深、白崇禧、张发奎等要人。当时的抗日战争进入紧要关头。1944年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每个月的头一天，都要召开国民大会，由当地军政长官主持会议。工农兵学商各界、机关职员都得参加。内容包括报告1个月来的抗战形势等等。1944年5月1日的国民月会，会场设在如今罗池路老干部活动中心旁边——当时是一个大体育场。卢焘居住的息尘寄庐，恰位于该体育场正对面。那天上午11时散会后，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的张发奎对白崇禧说：“卢寿公（卢焘字寿慈，人称寿公）就住对面。”于是由张前引，白随后，造访“寄庐”，拜会寿公。恰遇卢焘正在厨下手操吹火筒帮厨师吹火。白、张登堂入室便打招呼：“寿公，我们拜访您来了。”寿公遂撂下吹火筒连忙起身相迎，自嘲道：“骑马不见骑牛见，你俩早不来晚不来，偏偏此时，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话落遂将白、张二人迎上楼上客厅述聊。谈的内容是近期刊寇在河南一带结集，有南下湖北（当时武汉已沦陷）之意，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甚感不满。

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逝，国民党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路经柳州，也曾到东门路“息尘寄庐”造访过卢寿公。冯、卢亦是莫逆之交。

卢焘在柳州乃至广西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做了不少直接或间接与柳州、广西有关而又鲜为人知的利国利民利社会之事情，在此亦故举数例。

1907年，卢焘（当时仅25岁）与张铁城（江西瑞金人，1923年因反袁被杀害）在柳州创办樟脑公司，并设富贵升旅馆。一为筹集革命活动经费，二为以公司为掩护设立联络站，与各方革命志士，如刘古香、李德三、卢笛伯等十数人，共同开展革命活动。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穗就任非常大总统。当时湘、桂两省当局反对，

唯独任黔军代总司令之卢焘首先通电承认，并出师广西，命谷正伦为第一纵队出师柳州，胡瑛为第二纵队出师南宁。广西军阀慑于大兵压境，纷纷通电拥护孙中山，孙中山大总统电令委派卢焘为贵州省军总司令兼省长，加陆军上将军衔，遂使广西的割据局面统一在孙中山的革命阵营中。

1922年，孙中山令滇、黔军队统一组织成滇黔联军，卢焘任联军总司令，把原来盘踞在柳州，骚扰民众的范石生、刘震寰部，全部带出柳州，离开广西，开赴广东，以支持、拥护孙中山。

1932年，云南商人赠给卢焘两万银元，卢分文不留，将一万元汇到淞沪前线，支持抗日将领蔡廷锴所领导的19路军；另一万元送给广西省政府，由公路局长莫树杰（南丹人）经收，作为丹（南丹）池（河池）公路的修筑经费。

1938年，抗战期间，卢焘在柳州兼营东古陵农场，先后种植松树140万株，桐树25000余棵。同年，卢参加广西省抗日慰问团，前往第五战区信阳、合肥、徐州等地慰劳抗日将士，3月返柳。

1947年3月18日，卢焘致函粮食部部长谷正伦（原卢之部下），要求减免广西田赋军粮，并亲自前往面陈困难状况，终获减免粮55万担，并发还1941、1942两年度粮食库券，使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广西人民稍得喘息之机。

1948年，支持其子卢慈仪在柳州沙塘一带筹办“柳州德寿农场”旨在推动发展地方畜牧业。

1943年2月春节，卢焘在柳州市东门路64号息尘寄庐的大门各书写了如下的对联：

庆中华一统

祝全世大同

横额为“卡萨布朗加”。（按：“卡萨布朗加”系非洲的一个城市名称。1943年1月，中、美、英、苏四国首脑在此开会，认定对德、日两国作战计划，故在“息尘寄庐”门楣上挂悬“卡萨布朗”的字样）。

二门对子是：

轰炸东京飞不断

雄心硬夺太平洋

其横额是：“胜利属我”。以上两幅对联虽然格式比较简单，接近口语，然而就内容而言，却体现其爱国爱乡、救国救民的高尚情操。

[注：此稿经卢森烈士之子卢慈仪先生(76岁)及卢森烈士之外孙覃栋梁同志审阅，并作了某些订正。在此顺致谢忱)。